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tropical jungle. It features silhouettes of people in various poses, some appearing to be dancing or in motion. The foliage is rendered in bold, flat colors: red, brown, and teal. There are large, elongated red leaves, clusters of small teal circles on thin branches, and other abstract plant shapes.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

Memoria de mis putas tristes

苦妓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轩乐 译

版权信息

书名：苦妓回忆录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轩乐
出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5442-7559-0

出品：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制作：Stone & Company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栈的女人叮嘱江口老人说：请不要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昏睡的姑娘手里。

——川端康成《睡美人》



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我记起了罗莎·卡瓦尔卡斯，那个地下妓院的老鸨，当初一有新来的好姑娘她就马上通知信誉良好的顾客。我从未屈从于这一招或她的任何一个下流诱惑，但她还是不相信我原则的纯洁性。道德这事儿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她坏笑道，你等着瞧吧。她大约只比我小一点儿，多年没有消息，已经死了也说不定。但电话铃刚响一声，我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废话不说，我开门见山：

“就是今天了。”

她叹一口气道：哎哟，我忧郁的学究，你消失了二十年，一回来就只想跟我要些不可能的。她旋即恢复了自己的老练架势，给我报上了六七个讨喜的选择，但，她们都是被用过的。我拒不接受，坚持必须是处女且必须是今晚。她警觉地问我：你想证明什么？没什么，我答道，感觉最痛之处被刺中，我清楚自己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她无动于衷地说，学者们无所不知，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世界上最后的“处女”只剩你们这种生在八月的处女座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多给我点儿时间？灵感来前不打招呼，我对她说。但它没准儿可以等，她应道，语气一如既往，显得比任何男人都更渊博，她请我多宽限哪怕两天的工夫，好让她深入市场一探究竟。我严肃地驳回了她的请求：做这种交易，在我这个年纪，一小时等于一年。那就没戏了，她不带一丝犹豫地说，但是不要紧，这样才最带劲儿，真见鬼，我一小时内打给你。

我不用多说，因为远远就能看出：我丑陋、腼腆又过时。但我不想这样，于是努力往一切相反的方向伪装。直到今天，我才下决心坦然面对自己，即使只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我之所以从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说起，是因为从今天看回去，那是一段新生

命的起点，而通常在这个年纪，多数人都已经死去。

我住在殖民时期一栋向阳的房子里，在圣尼古拉斯公园一侧，我在这儿度过了生命里的每一天，没有女人也没有财富，我的父母曾在此生活又在此死去，我本也打算在这儿孤独终老，就在我出生的那张床上，在某个我希望晚点儿到来的日子里毫无痛苦地离去。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竞拍中买下了它，把底层租给一个在那儿开奢侈品店的意大利财团，二层留着以便和其中一个富商的千金芙萝莉娜·德迪奥斯·卡尔加曼托斯喜结良缘，她是引人瞩目的莫扎特演奏者，是通晓多种语言的加里波第^①拥护者，是这座城市里拥有无双天资的绝代美人：我的母亲。

房子宽敞明亮，有粉刷过的拱顶和棋盘式的佛罗伦萨马赛克地板，四扇玻璃门开向贯通的长阳台，三月的夜晚，母亲会和她的意大利表姐妹们坐在那儿唱爱情咏叹调。从那里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雕像，更远处是码头边的仓库和马格达莱纳河宽广的地平线，自那里仍须流过二十西班牙里，河水才能汇入海洋。房子唯一的缺点，是每日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会依次照进每扇窗户，因此，要想在炽热的阴影中睡个午觉，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关严。在三十二岁落得孤身一人时，我搬入父母先前的卧室，打通一扇去往书房的门，开始变卖生活中渐渐用不上了的东西，最后几乎所有物件都被处理掉了，只剩下书和那架自动钢琴。

有四十年我一直是《拉巴斯日报》的电讯编辑，那时的新闻简讯通过短波或摩斯密码穿梭于空中，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捕捉世界新闻并将之重组编写成给本地人看的文章。如今，依靠那份不复存在的职业支付的养老金，我勉强负担着自己的生活；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语法所带来的退休金更是微薄，而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毫无懈怠地撰写的周日专栏仅能得到微乎其微的报酬；更不用说那些免费发表的音乐戏剧简报，每当杰出的艺术家到来，我都自愿提笔，分文不取。虽然除码字之外什么都没做过，我却不曾有小说家的抱负与能力，我完全不在乎戏剧创作法则，能在这个行业谋生全凭我此生博览群书而得的启迪。说白了，我就是个没优点没光彩最没用的人，若不是我随后要竭力讲述的这个我回忆中伟大的爱的故事，我将没有任何东西能流传后世。

九十岁生日这天，如往常一样，我在早上五点醒来。星期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完成将发表于周日版《拉巴斯日报》上的固定专栏。清晨的种种征兆毫无例外地预示了不幸：自黎明开始骨痛便已发作，肛门也

刺烫难忍，在连续三个月的干旱后，暴雨的雷鸣终于开始轰轰作响。我把咖啡煮上，去洗了个澡，出来后加了蜂蜜，就着两片木薯面饼喝下了甜甜的一杯，然后穿上了粗布连衫家居裤。

那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我从没想过年龄能像屋顶的窟窿一样，指示着一个人还有多久可活。小时候就听说，一个人死后如果头发里生出的跳蚤恐慌地逃到枕头上，会使其家族蒙羞，我生怕这倒霉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于是警惕地剃短了头发才去上学，剩下的那点儿毛也要用犬类除蚤皂来清洗。这说明——我现在这么告诉自己——从小我的羞耻意识就比死亡意识更强烈。

几个月前我就预料到，自己的生日专栏不会像老套的文章那样哀叹时光的流逝，而是正好相反：赞美年华的老去。文章开头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我想是在那天之前不久：四十二岁那年，我忍着几乎令我窒息的背痛去找医生，但那并没引起他的重视。“就是您这岁数正常的疼痛。”他对我说。

“这样的话，”我应道，“是我的岁数不正常了。”

医生同情地冲我一笑：“我看您是个哲学家。”他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从衰老的意义上思考我的年龄问题，但转眼也就把它忘了。我习惯了每天早上伴着不同的疼痛醒来，随着岁月流逝，疼痛不断变换着位置和方式。有时，好像死亡的魔爪伸过来了，但第二天又会消失。那时候我听说，人衰老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于是我想我必是注定了要永葆青春，因为我的这张马脸永远都不可能像我父亲那加勒比风格的粗硬样貌或是我母亲那带罗马帝国气息的面容。事实上，那些最早的变化缓慢到几乎难以洞悉，当一个人内心仍感觉一切如故时，他人却能从其外表察觉到改变的发生。

当我年过五旬，发觉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空白，便开始想象衰老的样子。我会在家中四处寻找眼镜最后发现它就戴在眼前，会戴着它钻进淋浴间，还会在架起老花镜时忘记把近视镜先拿下来。有一天我吃了两顿早饭，因为我把第一顿忘记了。当我给朋友们重复讲前一周已讲过的故事时，他们都不敢提醒我，以至于我甚至学会了分辨他们警觉的神色。为此，我在心里列了一份熟悉面孔的清单，还有一份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在问候对方的时候，我却不能把脸和名字对上号。

性龄问题从未困扰过我，因为我的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她们而非我自

己，只要她们想，就知道怎么去做和为什么去做。现在的我会嘲笑那些向医生咨询的八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被某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坏了，却不知到了九十岁事情会更糟，但这并不重要：这是活着的风险。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生命的胜利：老人们在无足轻重的事上失去了记忆，但对真正感兴趣的事却很少迷糊。西塞罗^注一句话就将之说清道明：没有老人会忘记自己的宝贝藏在哪儿。

带着这般思索，我完成了专栏的初稿，此时，八月的太阳在公园的巴旦杏树林与内河邮政船间爆射出了光芒，那艘船因干旱而迟到了一个星期，正咆哮着驶入港口的水道。我想，我的九十岁到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不会试图去知道，自己为什么决定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电话，让她帮我用一个放荡的夜晚来纪念我的生辰，但在那毁灭性的召唤下我就是这么做了。多年来我让身体保持着圣洁的安宁，一心只在我的典藏书籍中重游徜徉，或是聆听我私人频道中的高雅乐章，但那天的欲望却仿佛上帝口谕般令人急不可待。打完那通电话，我便再也写不下去了。我把吊床挂在书房一个晒不到清晨阳光的角落里，躺在那儿，胸口被等待的渴望压迫着。

我曾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有个才貌出众、在五十岁时被肺病夺去了生命的母亲，还有个墨守成规、从未犯过错误、在某天清晨躺在自己的鳏夫床上离世的父亲，他走的那天人们签订了《尼兰迪亚协定》，结束了千日战争和之前那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一种未被预见也未被期望的方式改变了这座城市。无论本地人或异乡人皆因它的纯良民风和纯净阳光而热爱着这座我的灵魂之城，而大批被解放了的女性则让安恰大街，也就是后来的阿贝约路，现在叫哥伦布大道的地方的酒馆肆意红火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和不用付钱的女人睡过觉，至于少数几个不干这行的，我也会用道理说服或以蛮力强迫她们收下报酬，尽管这些钱随后就会被她们扔进垃圾堆。我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做记录，包含名字、年龄、地点以及对情境和风格的简要提示。到五十岁时，我已经分别和五百一十四个女人至少睡过一次了。当我的身子已经不再能应付这么多女人，不用纸我也可以继续数算下去了，我便停止了记录。我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不曾参加多人狂欢，也从未在公共场合与人淫乐，我没有分享过秘密也未曾向人讲述过任何灵与肉的冒险之旅，因为从年轻时起我就明白：凡事皆有报应。

唯一例外的，是多年来我与忠诚的达米亚娜之间保持的关系。那时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很像印第安人，强壮而粗野，话语简短而决绝，为了不打扰我写作，总是光着脚走路。我记得当时自己正在走廊的吊床上读《朝气蓬勃的安达卢西亚女人》^②，不经意间看见她正在洗衣池边倾着身子，短衬裙将她丰美的曲线暴露在外。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浪袭来，我一把掀起她的裙子，将她的内裤拽至膝盖，从后面发起了进攻。唉，老爷，她发出凄郁的哀叹，那里不是用来进而是用来出的。一阵深深的震颤让她的身体发起抖来，但她定定地站着没动。我为侮辱了她而感到羞耻，便想付给她两倍于当时头牌的报酬，但她分文未取，我只好增加了她的工钱，按每月一次的标准，每次都在她洗衣时，每次都从背后。

有一回我想到，那些关于床事的记录可被当作很好的素材用于讲述我堕落生命中的不幸，题目从天而降：“苦妓回忆录”。在公众面前我的生活了无生趣：不过是一个父母双亡、没有未来的光棍儿，一名四次入围西印度卡塔赫纳诗歌节的平庸记者，一个丑得经典到成为漫画家宠儿的人。可以这么说：自从十九岁那年的一个下午，母亲拉着我的手来到拉巴斯日报社，想看看能否发表我在西班牙语和修辞课上所写的校园生活报道开始，我的生活就变得无可救药了。那篇文章周日便被刊登了出来，社长还为它作了满怀希望的序言。多年以后，当我知道母亲为那次和随后的七次发表都掏了钱时，已经用不着羞愧了，因为我每周的专栏已靠自己的翅膀飞上了天，除此之外，我还做了电讯编辑和乐评人。

在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学士学位后，我便开始同时在三所公立学校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我是个糟糕的老师，没有接受过培训，没有天分，对那些把去学校当作逃离父母专制最简单的方法的可怜学生也不怀丝毫怜爱。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用我的戒尺威逼恐吓，让他们至少能从我这里学到我最喜爱的诗歌：法比奥，哦，真心痛，这些，你现在所看到的，孤独的空场，荒芜的山冈，曾是著名的意大利卡。^③老了以后，我才偶然间得知了学生们在背后给我起的烂绰号：荒芜山冈老师。

这些就是生活给予我的一切，而我也从未做过什么以获取更多。我会在课间吃完午饭，然后在下午六点去新闻编辑部捕捉空中的电讯信号。等到晚上十一点编辑部关门后，我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每星期我都会在红灯区睡两三晚，床伴的数量之多甚至让我两次荣膺年度客户桂冠。在附近的罗马咖啡馆吃完晚饭后，我会随意挑选一家妓院，从后门偷偷溜进去。我本是为了享乐而去，但那最终却变成了我工作的一部

分：那些政治大佬没有想到，他们偷偷向自己的一夜情人泄露的国家机密都被一纸板之隔的民意代表听了去。通过这种渠道，我也不可避免地发现，人们认为我之所以过着无可抚慰的单身生活是因为我一直在利用克立门^①街的那些孤儿来满足自己的鸡奸癖好。幸运的是我把这忘掉了，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也听到了人们谈论我的优点，而我懂得珍惜它们的价值。

我从没有什么挚交，少数几个接近这一称谓的人现在都在纽约。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死去的人，因为我觉得有罪的灵魂都去了那儿，为的是不去承受自己已逝生命的真相。自退休以来我几乎一直无所事事，除了每周五下午给日报交稿，或是尽另一些有一定重要性的义务：在艺术学院听音乐会，在我作为创办人之一建立的艺术中心看画展，或者出席公共改革发展委员会的某些公众会议，又或者去参加一些大的活动，比如阿波罗剧院举办的法布雷加斯^②演出季。年轻时我会去露天电影院，在那里人们可能会看到令人惊奇的月食，也可能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出令人惊恐的双肺炎。但比起电影来，我对那些夜晚的流莺更感兴趣，因为用买一张门票的钱就可以和她们上床，有时你甚至不用付钱或者可以赊账。现在电影院已不再是我的乐园：秀兰·邓波儿的风骚浇灭了我最后的一点儿兴趣。

我只出过几回远门：三十岁之前参加了四次西印度卡塔赫纳诗歌节，还有一次受萨克拉门托·蒙铁尔邀请去参加他在圣玛尔塔一家妓院的开业典礼，在一艘摩托艇上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至于在家里时，我吃得很少，也从不挑剔。自从达米亚娜已经老得不能做饭以后，我每天唯一的一顿正餐便是从报社下班后在罗马咖啡馆吃的土豆饼。

就这样，在九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没有吃午饭，也无法专心阅读，只盼着罗莎·卡瓦尔卡斯的消息。知了在午后两点的燥热中叫得人心烦欲裂，透过敞开的窗户，阳光不断移动，让我不得不给吊床换了三次地方。我总觉得自己的生日是全年最热的一天，虽然已经学会了忍受这一点，我这天的情绪仍难以安抚。四点钟时，我试着用堂巴勃罗·卡萨尔斯^③最终版本的巴赫六组大提琴无伴奏曲使自己平静下来。虽说被我视为一切音乐中最智慧的旋律，它们非但未能如往日般给我宽慰，反而将我推入了颓靡至极的状态中。第二曲的曲调在我听来有些慵懒，其间我睡着了，在梦里，我将大提琴的哀鸣与一艘离去的悲伤航船的呜咽混在了一起。就在这时，电话铃把我吵醒了，罗莎·卡瓦尔卡斯锈迹斑斑的声音让我活了过来。你真是走了狗屎运，她对我说。我找到了一个

比你期望的还要好的雏儿，就是有点儿麻烦，她还不到十四岁。我不在乎要给人换尿布，我没懂她的意思，开玩笑似的说。不是担心你，她说，我想问谁给我付三年监狱的钱啊？

没人会为此付钱，当然了，她尤其不会。她靠店里年龄小的那些姑娘收益，领她们入门然后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一个个都变成历史悠久的黑埃乌菲米亚妓院里悲惨的老妓女。她从未交过一次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达官贵人的世外桃源，从政府官员到市长办公室最不起眼的寄生虫都会到这儿来，对这位女主人来说，缺少随心所欲犯罪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她最后一刻的踟躅只是为了从中牟利：罪责越大要价便越高。分歧最后以服务费涨价两比索的方式解决妥当，我们约好晚上十点我到她那儿，要预先支付五比索现金。一分钟都不能早到，因为小姑娘要先哄弟弟妹妹吃饭睡觉，还要照顾因风湿病而瘫痪的母亲上床休息。

还差四个小时。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我心中渐渐涌满了酸涩的泡沫，搅得我难以呼吸。我试着用穿衣打扮的过程来打发时间，但收效甚微。事实上，也没什么新花样，可是就连达米亚娜都说我穿衣的架势像位主教大人。我用理发刀刮了胡子，等着管道里被阳光烤热的洗澡水冷却下来，然后仅仅是费力用毛巾擦干身子就又让我出了一身汗。我穿上能配得上夜晚好运的衣裳：白色亚麻布西装，领口浆过的蓝色条纹衬衫，还配上了中国丝绸的领带，打理得焕然一新、白如锌粉的高帮皮鞋，以及扣在衣领上的一块短链金怀表。最后，我把裤管往里卷了两圈，以免别人注意到我已缩短了一拃的身高。

人们都以为我很吝啬，因为没有人想象得到住在那座宅子里的我竟会这般穷酸，事实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我从移到床下的储钱盒里拿出两比索用于开房，四比索给老鸨，三比索给小姑娘，还有五比索来对付晚餐和其他琐碎的开销。也就是说，报社每月给我周日专栏的十四比索稿酬通通被用上了。我把它藏进腰带内侧一个隐蔽的小包里，然后喷上了L&K牌的花露水。这时，我感觉到了可怖魔掌的推搡，八点的钟声一响，我便摸黑下了楼，在恐惧的汗水中走向自己生日的璀璨前夕。

天已经凉下来了。哥伦布大道上，成群的单身汉在路中央成列停靠的出租车间为了足球大声争吵。一支铜管乐队在开满花的马桑树的树荫下吹奏着了无生气的华尔兹舞曲。一个正在公证员大街上等待钓上阔佬的穷苦小妓女像往常一样向我借火，而我也一如往昔地回答她：我已经

戒烟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了。从金线宫门前路过时，我在明亮的玻璃橱窗上照了照自己，与自我感觉不同，我看起来更老，穿得也更寒碜。

快到十点钟时，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把我载到公共墓园，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实际上要去哪里。他饶有兴致地通过后视镜看了看我，对我说，您别吓我，学者先生，但愿上帝能让我像您一样有活力。在墓园门口我们一起下了车，他没有零钱，我们得到拉顿巴^⑤去换一些，清晨的醉汉会在这家穷酸的小酒馆为他们死去的亲友哭泣。结清账后司机严肃地对我说：请小心，先生，罗莎·卡瓦尔卡斯^⑥的店连从前的影子都不剩了。我只好对他表示了感谢并开始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深信，对于哥伦布大道上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我走进一片贫民区，这里好像和我从前熟识的那片地方没有了丝毫联系。尽管依然是沙土炽烫的宽敞街道和门户大开的房屋，依然是未刨光的木板隔墙、苦涩的棕榈叶屋顶和碎石铺就的庭院，但人们的生活却不复平静。大部分房屋中都有星期五的欢闹，鼓钹声在人们的内脏中回响。任何人只要付五十生太伏就能参加自己喜欢的狂欢聚会，也可以在门口的台阶上免费蹭音乐跳舞。我焦急地走着，生怕这片土地把裹在条纹衣裳里的我吞没，然而除了一个靠坐在某座大门旁打瞌睡的消瘦的穆拉托人^⑦，没有人注意到我。

“再见了，博士，”他冲我真心实意地喊道，“干得愉快！”

除了对他表示感谢还能做什么呢？我在上坡途中被迫停下来三次调整呼吸，最后终于到达了坡顶。从那里，我看到巨大的铜色月亮正从地平线升起，而后，腹中一阵意外而急迫的翻滚搅起了我对目的地的恐惧，但很快便过去了。到街道尽头，楼区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瓦尔卡斯的店里。

她和从前不一样了。曾几何时，她是最讲究的老鸨，因而也是最有名的。过去的她膀大腰圆，惹得我们想为她冠上女消防队长的名号，一来是因为她身体臃肥，二来则是由于她能迅速解决顾客欲火焚身的问题。然而孤独巧妙地消瘦了她的身躯，揉皱了她的皮肤，磨尖了她的声音，竟使她现在看上去像个老去的小姑娘。她唯一从过去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一口完美的牙齿，为了再添增些许风情，她还把其中一颗镶了金。她仍旧在严格地为与之共度半世纪光景的亡夫服丧，此外还戴着一顶黑色圆帽，以纪念曾在她的不法勾当中给予她协助的已过世的独子。只有

那双明澈而残忍的眼睛生动如昔，透过它们，我才发觉她的性情并未改变。

店内的屋顶上悬着苍白的灯泡，货柜里几乎空无一物，甚至没有为这世人皆知却无人承认的臭名昭著的生意打掩护。在我蹑手蹑脚地进去时，罗莎·卡瓦尔卡斯正在招呼一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认出我还是在装样子。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等待她腾出空来，同时试着在记忆里重塑她过去的模样。当我们都还是青壮年时，她曾至少两次解救我于恐惧之中。我觉得她一定是读出了我的心思，因为她转了过来，警觉而紧张地审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没变，她悲哀地叹了口气。我想奉承一下她：你变了，变得更好了。说真的，她回道，你这张死马脸都好像有点儿活气了。大概因为我换了饲料吧，我打趣道。她一下子来了兴致。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根划船奴的棒子，她对我说，它现在怎么样了？我避开问题：我现在跟上次你我相见时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时候肛门烧得慌。她的诊断下得飞快：用少了。我只用它做上帝让它做的事，我对她说。但那儿有时确实烧得厉害，而且总是在月圆的时候。罗莎在她的工具箱里翻了翻，然后打开一小罐绿色的香脂，闻起来像是山金车膏。你让小姑娘用她的小手指抹，她一面说着，一面不知羞耻地用食指做着表现力十足的涂抹动作。我拒绝她说，感谢上帝我现在还不用拿瓜希拉人的药膏来保护自己。于是她嘲笑起来：哎哟，大师，饶了我的命吧。然后就把话题转回到了交易上。

小姑娘从十点钟开始就待在房间里了，她对我说。她漂亮，干净，教养也好，只是怕得要死，因为她有个朋友和一个加伊拉来的码头工人跑了，后来流了两个小时的血。但话说回来，罗莎承认道，这可以理解，因为加伊拉人可是有能让母骡快活的名声啊。她又折回到之前的话题上：小可怜儿，除了这一摊子事，她还得分在一家工厂上班，缝一整天的扣子。我不觉得这是多么艰苦的工作。男人们都会这么想，她反驳道，其实那比凿石头还累。她还向我坦白已经给小姑娘喝下了混有缬草的溴化水，现在她已经睡着了。我担心博取同情是另一个加价的诡计，但不是，她说，我一诺千金。规则是固定的：每一项服务单独计费，现金支付，先付款再享受。就是这样。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她的皮肤已经枯萎，行走也因粗棉长袜中的肿胀双腿而变得艰难，这些都让我心酸。满月就要升到天空中央，世界仿佛浸在绿汪汪的水中。店旁有一个棕榈叶搭成的天棚，政府常在那儿举办狂欢活动，因而地上摆满了矮皮凳，柱间系满了吊床。后院是果树

林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条走廊，横跨六间未经粉刷的砖坯房，窗上都挂着粗麻布帘子来挡蚊虫。唯一一间被占用的房里灯光暗淡，托尼娅·拉奈格拉^②正在广播中唱着一首失意爱情的歌曲。罗莎·卡瓦尔卡斯叹了口气道：博莱罗^③就是生命。我同意她的话，但直到今天才敢把它写下来。她推开门，进去了一下又出来了。她还在睡，她说。只要她的身子需要，你最好让她休息。你的夜比她的长。我有些迷茫：你觉得我该做什么？你会知道的，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平静语气说，你那么博学总是有什么原因的吧。随后便转过身去，把我一人留给恐惧。

没有退路。我揣着茫然的心进了房间，看到了在租来的巨大的床上熟睡的姑娘，她赤裸而无助，宛如初生。她面对门侧躺在那里，被从天花板射下的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强光照耀着。我在床边坐下凝视着她，五种感官仿佛着了魔。她有着深色的皮肤，让人感觉温暖。已经按照程序给她做了清洁和美容，甚至连她阴部初生的绒毛都没有忽略。还为她卷了头发，用天然的甲油给她的手、脚指甲染了色，但她糖蜜色的肌肤却显得有些干燥和缺乏保养。刚刚开始隆起的乳房还像男孩子的一样，但看上去即将因某种隐秘能量的涌动而爆发。她身体最好的部分是那双会迈出悄无声息步伐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一般。尽管开着电扇，她却浸在闪着磷光的汗水中，夜渐渐深了，闷热愈发难忍。无法想象出那张被胡涂乱抹的面孔的原本模样：用米粉末糊上的厚厚的硬皮儿上有两片补丁似的腮红，假睫毛、眉和眼睑都像被烟熏过一样，双唇涂上了巧克力色的口红，显得肥大。但任何妆扮都无法掩盖她的特点：挺拔的鼻梁，相接的双眉，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幼嫩的斗牛。

十一点时我照常去上了厕所，她那穷人家孩子的衣服按照一种富贵人家的精细规矩叠放在里面的椅子上：一件印有蝴蝶图案的棉布上衣、一条劣质的黄色短裤，还有一双龙舌兰叶编成的草鞋。衣服上放着一只便宜的镯子和一条带圣母像坠的细项链。梳洗台的托架上放着一个手包，里面有一支口红、一盒腮红、一把钥匙和一些零钱。一切都那么廉价，好像快要被用烂的样子，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像她这样穷。

我脱了衣服并尽可能地把它们在衣架上挂好，以免弄皱了丝绸衬衫和熨烫平整的麻布衣裳。为了不把马桶边缘弄脏，我像小时候芙萝莉娜·德迪奥斯教的那样坐在抽水马桶上解了小便，而且，不谦虚地说，我的水柱仍像匹小野马一般迅猛不断。在出去之前我探头看了看洗手池上的镜子。从另一边望向我的那匹马虽说还没有死，却透着阴森的气息，有着教皇一样的额下垂肉和臃肿的眼皮，从前那一头音乐家般的鬃毛如

今也只剩下细细的几缕。

“浑蛋，”我对他说：“如果你不爱我我怎么办？”

我光着身子坐在了床上，尽量不吵醒她。此时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带有欺骗性的红光，于是开始一点一点地打量她。我的食指肚沿着她湿润的后颈滑了下去，她全身从内而外地抖了一下，仿佛一声竖琴的和弦，她轻吐呓语，转向我，将我裹在她酸涩的喘息里。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没有醒，只是在挣脱后把头扭开转过身去了。被一阵意料之外的欲望驱使，我试着用膝盖把她的两腿分开，前两次尝试都被她夹紧的大腿拒绝了。于是我在她耳边唱道：黛尔加迪娜的床被天使围绕。她放松了些。一股热流从我的血管里蹿涌上来，我迟缓的兽性从漫长的睡梦中苏醒了。

黛尔加迪娜，我的心肝儿，我焦渴地哀求着。黛尔加迪娜。她忧郁地呻吟了一声，从我腿间逃开了。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身子蜷了起来，仿佛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缬草药水对我肯定像对她一样有效，因为在她身上、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发生任何事。但我也无所谓。我问自己，在自觉羞耻、伤感、冰冷如一条鲑鱼时把她叫醒又能有什么用呢？

清晰地、不可抵挡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八月二十九日，施洗者圣约翰殉道日的凌晨到了。有人在街上失声痛哭，但无人理会。我为他祷告，也许他会需要；我也为自己祷告，感恩我所获的福泽：谁都不要欺骗自己，不，想想一个人所等待的，将会比他所见过的更持久。①小姑娘在梦中呢喃着，于是我也为她祷告：因为一切都将这样过去。②我把收音机和灯全关掉之后就睡了。

清晨醒来时我已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小姑娘依然背对着我，以一种胎儿的姿势睡着。我隐约觉得自己曾感觉到她在黑暗中起来过，觉得自己听见了冲水的声音，但那或许只是个梦。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不懂诱惑的诡计，从前总是随意挑选夜伴儿，考虑更多的是价格而不是喜好，然后我们会做无爱之爱，多半连衣裳都不脱光，并且总是在黑暗中，好把对方想象得更好些。那一晚，我发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愉悦，便是在没有欲望相催、没有羞怯阻碍的情形下欣赏一个熟睡女人的身体。

我在五点钟不安地起了床，因为我的周日专栏应该在十二点前送

审。伴着月圆带来的烧灼感，我准时完成了大便的排泄，在拉下冲水链时，我感到过往的怨恨都从下水道流走了。当我神清气爽地在卧室穿好衣服时，小姑娘还在黎明柔和的光线中仰面睡着，手臂摊开，身体摆成十字，从床这头伸到那头，完全主宰着自己的贞洁。愿上帝佑你保守它，我对她说。我把我剩下的所有钱，她的和我的，都为她放到枕头上，然后吻了吻她的额头，道了永别。这栋房子，如清晨时分所有其他的妓院一样，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从果园的大门离开了，以免碰到任何人。在炽热阳光下的街道上，我感觉到了我的九十岁的重量，于是便开始一分一秒地数算我死前所余夜晚的每一分每一秒。

在我写这部回忆录时，父母书架上的书已经所剩无几，拜蛀书虫的耐性所赐，书架搁板马上就要塌了。说到底，为了完成在这世间所余的任务，我的所有种类的词典、堂贝尼多·佩雷斯·加尔多斯^①所著《民族轶事》的前两辑，再加上帮助我理解了母亲因肺病而逐渐改变的性情的《魔山》，这些对我来说便足够了。

和所有其他家具相异，与我本人也不同，我的写字桌随时间流逝而显得愈发结实健康，因为它是由我身为造船木匠的祖父用上等木材打造而成的。即便不写作，每天早上我也会带着那致使我失去了太多爱的毫无用处的严苛态度把桌子打理一番。我在手边摆着我的书籍同谋：皇家语言学院一九〇三年版的《首部插图词典》两卷；堂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②的《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珍宝》；帮我解答语义学疑问必不可少的安德烈斯·贝尤^③的语法书；堂胡里奥·卡萨雷斯^④的新版《意识形态词典》，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反义词和近义词部分；尼古拉·琴加雷里^⑤的《意大利语词典》^⑥，它可以助我更好地理解从襁褓中就开始学习的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语词典，因为另外两门语言都来源于拉丁语，我便将它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靠左的地方，总是放着五页横线公文纸，是我用来写周日专栏的，还有一个角杯，盛放让墨迹迅速变干的砂粉，比起现代的枕形吸墨纸，我更喜欢前者。靠右边放着墨水瓶和搁有金质钢笔的轻木笔架：我仍旧保持着手写的习惯，用的是芙萝莉娜·德迪奥斯教我的浪漫字体，她这样做是怕我学会她丈夫的公务笔迹，他在咽气之前一直是公证人和公共会计。很久以前，报社下了命令，要求每个人都用机器写作，好方便估算排字机里的铅块数，令排版更加精准，但我始终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多亏了令人厌恶的最资深员工的名号，我才得以坚持原先的方式，先手写，再母鸡啄米似的把文章用打字机誊下来。现在，我虽已

退休但并未就此认输，尽情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可以把电话听筒摘下来免得任何人打扰，而且也没有审查员从背后窥探我写作的内容。

我没有狗没有鸟也没有用人，只有忠诚的、把我从那些意想不到的困境中拖出来的达米亚娜，虽然视力大不如前，也没有了那股机灵劲儿，她仍旧每周过来一次，做她需要做的家务。母亲在临终时曾哀求我趁年轻找个白种女人结婚，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她同名的女儿，她的母亲和外祖母也都叫芙萝莉娜。我听进了她的哀求，但对年轻一词的理解实在太过灵活，因而从不觉得为时已晚。直到某个炎热的中午，我进错了门，走入了帕洛马雷斯·德卡斯特罗家位于普拉多马尔的宅子，撞见了赤身裸体的希梅娜·奥蒂斯。她是这家女儿中最小的一个，那时正在邻近的卧室午休。她背对门侧卧着，突然扭过头来看我，动作快得让我来不及躲闪。啊，对不起，我说着，心跳到了嗓子眼儿里。她微微一笑，宛如羚羊般优雅地转了过来，把整个身体袒露给了我。那一刻，整个房间都被她私密的友好充满了。她并不是完全赤裸的，因为她耳旁别着一朵橙色花瓣的毒花，就像马奈在《奥林匹亚》中画的那样，右手腕上套着一只金镯子，颈上还戴着小珍珠项链。我当时想，余生中再也看不到比这更撩人的了，而今天我可以证明自己想得没错。

我为我的蠢笨感到羞愧，一把撞上了门，并决心把她忘记。但希梅娜·奥蒂斯却不让。她一面托我们共同的女性朋友捎来口信、言语挑逗的纸条和粗鲁的威胁，一面散播谣言，说我们从未交谈便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无法抗拒。她有着一双野猫的眼睛，一具穿不穿衣都无比诱人的身体，还有一头茂密、蓬乱的金色长发，从中飘散的女人味道甚至让我伏在枕上恼火哭泣。我知道这永远都不会到达爱的程度，但她朝我身上掷来的撒旦的诱惑实在灼热难忍，只要碰见绿眼睛的小婊子我就企图泄欲。我一直没能熄灭对她在普拉多马尔那张床上的回忆之火，于是便向她缴了械，正式地求了婚，交换了戒指，在圣灵降临节前发布了盛大婚礼的公告。

比起在社交俱乐部里，消息在红灯区炸开后影响更大。起先引来的是嘲讽，而后转化成那些宣称婚姻并不神圣反而很荒唐的女学究们的某种不折不扣的烦恼。在订婚期，我们在我未婚妻家挂满亚马逊兰花和欧洲蕨的露台上恪守着基督教义要求的所有礼仪规范。我会穿着白色西服、带着手工串珠或瑞士巧克力之类的礼物在晚上七点到达，之后我们

时而用暗语时而用正经话交谈至十点，阿尔汉尼达姨妈在旁边陪护，但一眨眼的工夫便睡着了，就像那个时期小说里的约会监护人一样。

随着我们对彼此了解的加深，希梅娜渐渐地贪婪起来。当六月越来越闷热潮湿，她脱掉了胸衣和衬裙，这让人不难想象她在黑暗中所能拥有的毁灭力量。在成为未婚夫妻的两个月后我们便已无话可说，她默默地筹划着生子事宜，不停地为新生儿织羊毛衣物。作为体贴的未婚夫，我向她学习了钩织技艺，于是婚礼前所剩的无用时光便这样过去了：我给儿子织蓝色袜套，她给女儿钩粉色袜套，看看谁能猜中性别，直到所钩织的已经够五十个孩子穿了才停手。但在十点之前，我会爬上一辆马车到红灯区去，在活人的平安中过我的夜。

红灯区为我举办的告别单身狂欢舞会和社交俱乐部中压抑的晚会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反差让我有机会弄清两者中的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世界，我幻想着两个都是，只不过在各自特定的时间。无论在哪一个里面时，我都会看到另一个像被撕裂般喘息着渐行渐远，仿佛两艘在远海呜咽分离的船。结婚前夜，在“上帝的权能”酒馆开的舞会包含了一个只有那位搁浅在淫欲中的加利西亚神父才能想出的终极仪式：他让所有的女员工都披上头纱、戴上橙花，在一场世界性圣礼中通通嫁给了我。那真是一个肆意渎神的夜晚，她们中的二十二个都向我承诺了爱和服从，而我则向她们许下了直至我入土之日的幸福和供养。

我没能睡着，因为预感到了某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就要发生。从后半夜起，我就开始数算教堂钟表上时间的脚步，直到那可怕的七次钟声敲响——那时我本应该在教堂了。电话铃在八点吵了起来：漫长、固执、不可预测，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仅没接，甚至都没有喘气。快到十点的时候，他们开始敲门，最初是用拳头砸，后来则是熟悉而可憎的声音的叫嚷。我害怕他们不管不顾地把门撞开，但到了十一点钟，房子便处在大难过后的那种铺展蔓延的寂静中。我哭了，为她也为我自己，之后我虔心祷告，祈求此生与她不复相见。一定是哪位圣徒听到了我的话，希梅娜·奥蒂斯当晚就出国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回来，她嫁得很好，生了七个本可能是我的骨肉的孩子。

在这次对社会礼仪的公然亵渎之后，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保住了我的职位和在《拉巴斯日报》上的专栏。然而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去第十一版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二十世纪带着盲目的迅猛到来了。进步成为这座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飞起来了，一个生意人从一架容克飞机中抛下了一大袋信件，发明了航空邮政。

唯一保持不变的就是我在报纸上的专栏。新一代人猛烈地攻击它，仿佛在攻击一具必须被毁灭的旧时代的木乃伊，但我毫不退让，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文风，反抗着创新的氛围。我对一切都充耳不闻。我已年过四十，但那些年轻编辑却给它取名为私生子穆达拉^①专栏。时任主编也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请求我跟一跟时代的潮流。他庄严肃穆地说了句仿佛是刚刚发明的话：世界在前进。是啊，我对他说，在前进，但还是在绕着太阳前进。他留下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别的电讯编辑了。而今天我知道了我是对的，也知道了为什么是对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对生活都太贪婪，以致身体和灵魂都忘记了对未来的期盼，直到现实告诉我们未来和我们曾经的梦想不一样，便又开始怀恋旧日。我的周日专栏恰似往昔的残垣断壁间的一处建筑古迹，它不仅为老人，也为那些不惧老去的年轻人而存在。于是专栏又回到了社论版，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能登上头版。

现在，每当有人问起，我总是用事实来回答：是妓女们不给我结婚的时间。然而我也得承认，直到九十岁生日那天从罗莎·卡瓦尔卡斯^②的店里离开并决心再也不去挑逗命运时，我才找到了这样的解释。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看见一些倚着公园铁栅栏的军人后，我变得心绪不宁。我撞见了达米亚娜，她正跪在客厅里擦地板。那双在她这个年龄仍保持着青春状态的大腿，在我体内激起了属于另一个时代的震颤。达米亚娜该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用裙子遮住了腿。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亚娜，您记起了什么？我本来什么都没记起来，她说，但您的问题提醒了我。我感到有什么压在了胸口。我从来都没爱过，我对她说。她马上回答：我爱过。她没停下手里的活儿，把话说完了：我为您哭了二十二年。我的心猛地一抽。为了找个体面的台阶下，我对她说：咱们本来可以是很好的一对儿。现在才告诉我这个没用了，她说，因为它连安慰的效果都起不到了。在离开我家的时候，她用再自然不过的语气说：您可能不会相信，但感谢上帝，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已在家里各处摆上了插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留了一张小卡片：我希望您活到一百岁^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这样坐了下来，继续写前一天写了一半的专栏。我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必须扭断天鹅的脖子^④，掏心掏肺，还不能让人注意到我的泪水。我突然被一阵迟来的灵感击中，决定用一则公告来终结这个专栏，说我不必悲哀地死去，就用它为我漫长而体面的人生画上幸福的句点吧。

我本想把它放在报社的传达室后就回家。但没能成功。因为全体员工都在等着为我庆祝生日。大楼正处在修缮中，到处都是冰冷的瓦砾和脚手架，但为了生日宴会，工程都暂停了。木工桌上摆着为举杯祝福准备的饮料，还有用彩色包装纸裹着的生日礼物。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下不知所措的我，被照进了所有用作纪念的相片。

我很高兴在那儿见到了电台和其他报社的记者：有保守派晨报《新闻报》的，有自由派晨报《先驱报》的，还有感情用事的晚报《国家报》的，它总是试图用激情澎湃的系列报道缓解公共秩序中的紧张局势。这些人聚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这座城市的精神一向倡导，在高层掀起出版战争时不同阵营的士兵之间要保持无瑕的友谊。

尽管那时并非他的工作时间，审查员堂赫洛尼莫·奥尔特加也出现在了那里。我们都管他叫可恶的九点先生，因为每晚那会儿他都会带着那根保守酷吏的血红色铅笔准时到达，直到确认第二天的版面上没有任何一个逍遥法外的词语后才会离开。他很讨厌我，或许因为我有股文法学者的傲慢，或许因为我在觉得意大利语词比西班牙语词更能表达我的想法时使用前者却不加引号也不用斜体——这本该成为近似语言之间合理的使用规则的。在忍受了四年之后，我们最终接受了他，就当是我们自己心怀鬼胎吧。

秘书们把一个蛋糕拿进了大厅，上面插着九十根点燃的蜡烛，它们逼我第一次直面自己年龄的数字。人们唱起生日歌时，我不得不咽下泪水，并毫无缘故地想起了那个小姑娘。那不是一闪而过的怨恨，而是对一个我不曾料到会再记起的孩子迟来的同情。一阵沉默过后，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把刀，让我切蛋糕。因为怕被嘲笑，没人愿意冒险即兴说一段贺词。而我也死都不愿意去回应谁的祝福。宴会结束的时候，主编——我对他从来就没有过太多好感——把我们拉回到了无情的现实。现在，尊贵的九十岁老寿星，他对我说，您的专栏文章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它都在灼烤着我，仿佛衣兜里的一块炭火，但感动的情绪已经把我浸透了，使我无心用自己的辞呈给宴会泼冷水。我于是说：这次没写。主编非常不高兴，这个错误即便在上世纪都已是不可原谅的了。请您理解一下吧，我对他说，我度过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夜晚，醒来时恍恍惚惚。那您就该把这个写下来，他尖酸地说道。读者们一定很想得到第一手信息，好知道九十岁的生活是什么样，一个秘书插嘴道。也许那是个甜美的秘密，她说着，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或者不是？一道炽热划过了我的脸。妈的，我想，脸红可真把我出卖了。另

一个光彩照人的秘书用手指了指我。了不起，您这么大岁数还能脸红，真优雅啊。她有失分寸的言语在我脸上又多添了几抹红。一定是个棒极了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可真忌妒。她随后给了我一个吻，唇印留在我的脸上。摄影师们没有手下留情。头晕目眩的我只好把文章交给主编，告诉他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东西在这里。最后一阵掌声让我发蒙，我溜走了，免得被他们当场发现那是我在卖了半个世纪苦力后的辞呈。

当晚在家里拆礼物时，我的心里依然惴惴不安。铸排工没有送对东西：他们给我买了之前生日已经收过三个的电咖啡机。印刷工送了我一份去市里的养殖场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办公室给了我一个象征性的红包。而秘书处则送给我三条印着红唇图样的丝质内裤，还附有一张卡片，她们在上面都自告奋勇地要为我脱掉它们。我突然想到，年老的一个美妙之处就在于，年轻的女性朋友会放松地挑逗我们，因为她们都觉得我们不行了。

我一直没弄清是谁送了我一张斯特凡·阿斯肯纳瑟^②版的肖邦二十四首前奏曲的唱片，编辑送我的大多是畅销书。在我还没拆完礼物的时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来一通电话，问了我一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跟小姑娘怎么回事？什么事都没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你甚至都没叫醒她，觉得无所谓，是吗？罗莎·卡瓦尔卡斯问。女人永远都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第一次不屑的男人。我对她说小姑娘不可能是缝扣子缝到那么累的，也许她只是害怕那种场景，在装睡。唯一要紧的，罗莎说，是她认为你不行了，我不希望这事传得沸沸扬扬。

我没有表现出她所期待的惊讶。即便如此，我对她说，谁也不能占有她，无论她醒着还是睡着，因为她的状况实在太悲惨了：都得去医院了。罗莎·卡瓦尔卡斯放低了声气：都是因为这单生意做得太急了，但是还有办法，你等着吧。她承诺会让小姑娘坦白，如果事情真是那样，便要她还钱，你觉得怎么样？不用了，我对她说，什么事都没发生，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是个测试，证明我已经不能再搞这些了。在某种意义上那女孩是对的：我已经不行了。我挂了电话，全身被一种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解放感充盈，终于，我从自我十三岁起便开始奴役我的束缚中解脱了。

晚上七点，我受邀作为贵宾去艺术学院礼堂聆听雅克·蒂奥^③和阿尔弗雷德·科尔托^④的音乐会，塞萨尔·弗兰克^⑤的小提琴及钢琴协奏曲得到精彩演绎，中场休息时，我听到如潮的赞扬。我们的音乐巨匠佩

德罗·比亚瓦^注拖着我去化妆间，为我一一介绍演奏者。我当时晕头转向，甚至向他们称赞起他们压根儿就未演奏的舒曼的协奏曲，有人无礼地当众纠正了我。由于无知而弄混两首协奏曲的印象在本地音乐圈中播散开来，而我接下来在周日发表的音乐会乐评中为补救而写的不知所措的辩解更是把事情越抹越黑。

在漫长的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能杀人了。回到家时我被那个小恶魔折磨得烦恼不已——它总在我们耳边吹风，说着那些我们没有及时给出的致命回击——甚至阅读和音乐都不能平息我的怒气。幸运的是，罗莎·卡瓦尔卡斯在电话里用吼叫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拽了出来：报纸看得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本以为你是一百岁而不是九十岁呢。我被激怒了：你他妈就是这么看我的？恰恰相反，她说，你看上去好得让我吃惊。多好啊，你不是那种往上加年龄好让别人认为他们身体特棒的色老头儿。她没有过渡就直接跳转了话题：我给你准备了礼物。我着实吃了一惊：什么礼物？那个小姑娘，她说。

我想都没想：谢谢，我对她说，但是这篇儿已经翻过去了。她一口气说了下去：我会让她在檀香木煮的水里泡澡，然后用中国软纸把她裹起来送到你家去，全都免费。我态度坚决，但她用来反驳的理由也很实在，让我感到了她的真诚。她说星期五那天，小姑娘是因为已经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子所以状态才那么不好，而她也的确对血腥强暴充满了恐惧，但当时已接受了辅导，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和我在一起的那晚她曾起来去厕所，看我睡得那么沉便没忍心叫醒我，当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听起来一派无用谎言，我被激怒了。那好，罗莎·卡瓦尔卡斯继续说道，即使事情真是那样，小姑娘也已经后悔了。小可怜儿，她就在我面前呢，你要跟她说两句吗？不，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对她说。

报社秘书处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了。社长希望明天上午十一点在办公室见我。我准时到了。施工的轰鸣令人难以忍受，锤子的敲击、水泥灰和焦油烟让空气变得稀薄，不过编辑部已经学会了在惯常的混乱中思考。与之相反，社长的办公室里仍旧凉爽、宁静，保留着一方不属于我们的理想国度。

还透着青春气息的马可·图里奥第三看到我进屋便站了起来，但没有挂断正通着的电话，他从桌上伸过手来与我握了握，接着示意我坐下。我甚至觉得电话那头并没有人，他只是装样子给我看，但后来发现他的确在和市长交谈，那实在是一次亲密敌人间的艰难对话。此外，我

还认为他在想方设法地在我面前表现得精力充沛，因为他与那位高官通话时一直站着。

人人都能注意到他那副故作优雅的德行。他刚满二十九岁，会四种语言，有三个国际认可的硕士学位，不像第一任终身社长，他的祖父。后者当年靠贩卖妇女发财后做了一名半路出家的记者。他态度随和、相貌俊美、举止稳重，唯一有损他优秀形象的是他声音中的虚伪。他穿着一件运动衫，翻出的领口上还别着一朵兰花，每样东西都与他十分相配，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但却没有任何一样与外面的气候相合，一切都只为他办公室中的春天打造。而我，在花了近两个小时穿衣打扮后，仍感到了穷酸带来的羞耻，于是愈发恼怒了起来。

这些还不是全部：致命的剧毒藏在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上。头上标着小十字的，是那些挨个去世的员工。我是右数第三个，戴着船夫帽，领带结系得很大，领带夹上有颗珍珠，那会儿我刚开始蓄上校军官的那种胡子，后来到四十岁才刮掉，还戴着一副神学院学生那样的金属框眼镜，半个世纪后，我不再需要它了。多年来我看着这张挂在不同办公室中的照片，直到此刻才察觉到它传递的信息：最初的四十八名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其中最小的那个因多起谋杀罪被判二十年监禁，如今都已刑满释放了。

打完电话时看见我正望着那张照片，社长笑了。那些小十字可不是我标上去的，我觉得它们很难看。他在书桌前坐下，改变了腔调：请允许我告诉您，您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出人意料的一个。面对我的讶异，他抢先说道：我这么说是因为您的辞职。我费力地回道：都已经做了一辈子了。他答说，正因为如此，辞职才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他认为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出色，所有那些关于晚年的描述都是他所读过的最出彩的，做出近乎“褫夺公权终身”的决定来把专栏停掉毫无道理可言。幸好，他说，可恶的九点先生在社论版即将付印的时候读到了它，认为不能通过。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用他的“托尔克马达^註之笔”把文章从头到尾地画掉了。我今天早上得知这件事时给政府发去了抗议信。这是我的职责，但我可以告诉您，我个人对审查官的专断满怀感激。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做好停掉专栏的准备。我真心诚意地请求您，别在远海弃船而去。最后他气势恢宏地总结道：咱们还有很多关于音乐的话题可以聊嘛。

看他这么坚决，我不敢再用别的理由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事实

上，问题是到了这种时候我还是找不到一个得体的理由来放弃这份苦差，而仅仅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再一次答应他的念头让我惊恐。我只能压抑住自己，免得被他看出那催我落泪的不知羞耻的情绪。于是如从前一样，在多年后我们再一次留在了原地。

接下来的一周，在一种更接近不知所措而非快乐的状态的控制下，我去了养殖场，领回了印刷工送我的猫。我对动物没什么好脾气，就像对会说话前的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它们的灵魂都是哑的。我并不恨它们，但却无法忍受它们，因为我从未学会如何与它们交流。比起和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和一只狗更能相互理解——教它按时吃饭排便、回答问题，以及分担自己的悲苦——在我看来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但是如果不回去领回这只猫又会令工人们难堪。况且，那真是只绝美的安哥拉猫，毛发粉嫩、光洁，眼睛明亮，喵喵的叫声仿佛人的言语。他们把它放入一个柳条篮里交给我，还附上了一张血统证明以及一本类似自行车组装机说明书的主人手册。

一队巡逻兵正在检查过客的身份，验证后才准许他们从圣尼古拉斯公园经过。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场景，也无法想象还有比我衰老的症状更让人沮丧的事物。那是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巡逻队，听命于一名几乎还是少年的军官。那些士兵都是来自高原的人，生硬而沉默，身上散发着牛圈味儿。军官在海滩上监视着那些有着安第斯式红彤彤面颊的人。在看过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后，他问我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一只猫，我说。他想看看它。我小心翼翼地把篮盖掀开，生怕它跑掉。一个士兵想看看篮子深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被那只猫抓了一爪子。军官插话了。是只安哥拉宝贝，他说。他一边抚摸它一边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猫没有攻击他，但也没理他。几岁了？他问。不知道，我说，别人刚刚送给我的。我这么问您是因为它看起来很老，十岁了，有可能。我本想问问他怎么知道的，还想问很多其他问题，但我又没有心情和他说话，尽管他举止得体、言辞优雅。我觉得它是一只被遗弃的猫，经历过很多事，他说。看好它，别指望让它适应您，您得去迁就它，放任它，直到您获得它的信任。他盖上了篮盖，问我：您做什么工作？我是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世纪以前，我对他说。我不怀疑，他说。他和我握了握手，用一句可以是忠告也可以是威胁的话与我道了别：

“您保重。”

中午的时候我把电话线拔了，想在一组美妙的乐曲中寻求躲避：瓦格纳的狂想曲与管弦乐，德彪西的萨克斯，布鲁克纳的弦乐五重奏，这

是他充满狂暴灾变的作品中的伊甸园缓流。猛然间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书房的黑暗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溜到了我的桌子底下，不像一具活的身体，而像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它蹭过了我的脚，我惊叫着跳了起来。是那只猫，它有着美丽的毛茸茸的尾巴、神秘的徐缓姿态和神话般的血统，和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生物独处一室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大教堂敲响了七点的钟声，玫瑰色的天空中有颗明澈的孤星，一艘船抛出一声无法慰藉的道别，我感觉喉咙里有一个因所有本可以有但却没有的爱而结的不解之结。我不能再忍了。我摘下电话，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拨了四个号码，慢慢地，免得弄错，响三声之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嗯，女人，我舒了口气道：请原谅我今天早上的坏脾气。她很平静：没事儿，我正等你电话呢。我提示她：我希望小姑娘等着我，上帝把她送到世上来时的样子，并且脸上不要涂抹任何东西。她从嗓子里挤出笑来。听你的，她说，但你也就丢失了一件一件脱掉她衣服的乐趣了，老年人都喜欢那样做，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对她说，因为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老。她完全赞同我的说法。

“好的，”她说，“今天晚上十点整，在她冷下来之前。”

三

她可能叫什么名字呢？老鸨没有告诉我。她向我提起她时只会说：小姑娘。我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名字，就像“我梦中的姑娘”或是最小的那艘三桅船^註那样。罗莎·卡瓦尔卡斯给她的每个手下在接待每一位顾客时都起了不同的名字。我曾从看容貌猜名字的游戏中得到过很多乐趣，而且从一开始我就确定小姑娘有一个很长的名字，比如菲洛梅娜、萨杜尔妮娜，或是妮可拉萨。正当我想着这些时，她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起我来。这时我觉得她好像留下了一个与她身体大小、形状相同的血潭。那一瞬我惊惧万分，直到发觉是汗液浸湿了床单后才平静下来。

罗莎·卡瓦尔卡斯建议我小心些待她，因为她对第一次的恐惧仍在持续。不仅如此：我觉得隆重的仪式加重了她的惧怕，缬草药水的剂量不得已被加大了，她睡得那么沉静，以致让人不忍在没有摇篮曲陪伴的情形下把她叫醒。于是我开始一边用毛巾擦干她的身体，一边对她低声哼唱起那首讲述黛尔加迪娜——那个被自己的国王父亲追求的小女儿——的歌曲。在我给她擦身的同时，她跟随我歌声的节奏一点一点地把她被汗水浸湿的侧影展示给了我：黛尔加迪娜，黛尔加迪娜，你会是我亲爱的宝贝。那真是无尽的欢愉，因为刚为她擦干一边，另一边又出汗了，于是歌声永远不会停下。起床吧，黛尔加迪娜，穿上你的丝裙，我在她耳边唱着。到最后，当国王的仆人们发现她已渴死在床上时，我感觉我的小姑娘听着那名字来到了苏醒的边缘。所以她就是：黛尔加迪娜。

我穿着满是唇印图案的内裤回到床上，在她身旁躺下。伴着她平静的呼吸声，我一直睡到了五点。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没有洗漱，但就在这时，我在浴室的镜子上看到了用口红写下的句子：老虎不觅远食。我知道它昨晚还不在那里，而且不可能有人进入过这个房间，所以

便把它视作魔鬼赠予的礼物。走到门口，一声可怖的雷鸣吓了我一跳，随后屋子里便弥漫起湿润泥土警示性的味道。我没有安全逃离的时间了。在找到出租车前，一场瓢泼大雨粗鲁地浇了下来，这样的雨通常会在五月到十月间把城市搅得一团乱，街道上的炽热沙土会变成凶猛的洪流涌到河里，并把所到之处摧毁殆尽。在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之后，那个诡异九月的降雨既是上天的恩赐，又充满了毁灭性。

从打开家门的那刻起，我的身体便有了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是孤单一人。在猫跳下沙发、跑到阳台上躲起来时，我瞄了它一眼。它的盘子里剩有些许食物残余，但这顿吃的不是我为它放的。它尿液的臭味和温热的粪便已经把一切都污染了。我像研究拉丁语一样研究过它。主人手册告诉我，猫会刨地来掩埋自己的排泄物，在一些没有庭院的房子里——比如我的这套——它们会在花盆或是别的隐蔽角落解决这件事。明智的做法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准备好一个装满细沙的盒子来引导它们的行为，我就是这么做的。手册上还说，它们在新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小便以标示自己的领地，可能这也是真的，但手册上并没有教怎样去应对。我跟随它的行迹以熟悉它原有的习惯，却没找到它隐匿的秘密、休息的地点，也摸不准它反复无常的脾性。我试图教会它按时吃饭、使用阳台上的沙盒、不在我睡觉时跳上床，也不去嗅桌上的饭菜。但我没能让它明白，这个家是它享有的权利，而非它的战利品。于是我便由着它去了。

傍晚，我与大雨正面交锋，伴之而来的风仿佛飓风一般，一副要把房子拆毁的样子。我连着打了几个难受的喷嚏，头骨刺痛，还发了烧，却感觉自己正被某种力量和决心控制。从前无论何时何地，为了何种理由，我都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我把小锅放在地上来接雨，发觉去年冬天后家里又多了几处窟窿。最大的一个已经让书房右侧发了大水。我赶忙跑去拯救住在那里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但当我把书都取下来时，才发现有一股高压水流正因墙体内部的管道破裂喷涌而出。为了争取时间救书，我用抹布把能堵的地方都堵上了。公园里雨水的轰响和大风的嚎叫越来越剧烈，突然，一道幽幻的闪电和同期而至的雷鸣携一股强烈的硫黄味儿浸透了空气，风击碎了阳台的玻璃窗，可怖的海洋风暴摧毁了门锁，冲入房中。然而，不到十分钟，风雨便戛然而止。灿烂的太阳晒干了散满搁浅垃圾的街道，把热气带了回来。

大雨过后我仍然感觉自己并非独自在家。我唯一的解释是，就像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会被忘记一样，有些未曾发生过的事也可能留在记忆

里，仿佛真实发生过一般。回忆大雨中的紧急状况，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家，而是一直都有黛尔加迪娜陪伴。在夜里，我感觉她离我是那么近，甚至都能察觉到卧房里她呼吸的声响，我枕头上她面颊的轻轻颤动。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那么多的事。我记得我踩上了书房的矮脚凳，记得她穿着花朵图样的小裙子醒来，从我手上接过书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我看着被雨水浸透了的她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与暴雨抗争着从房子的这边跑到那边。我记得第二天她是怎样做的那顿不曾存在的早餐，记得在她准备餐桌时，我正忙着擦干地板、整理遭遇海难的屋子。我永远都无法忘记我们吃早餐时她那忧郁的目光：为什么你这么老了才认识我？回答她时我说了实话：一个人的年龄并不是他有多少岁，而是他感觉自己有多少岁。

自那时起，我便在记忆中拥有了她，那么明晰清澈，让我可以对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会按照自己的精神状态给她的眼睛变换颜色：醒来时是水蓝色，笑的时候是糖浆色，不高兴时是火焰色。我还会依照自己的情绪变化选择年龄、身份，并为她穿上与之相配的衣衫：二十岁时爱上的见习修女、四十岁时遇见的发廊女、七十岁时认识的巴比伦皇后或是一百岁时恋上的圣女。我们会一起唱普契尼的二重唱、奥古斯丁·拉腊^①的博莱罗曲、卡洛斯·加德尔^②的探戈曲，再一次证明不唱歌的人甚至无法想象歌唱的快乐。如今，我知道那不是幻觉，而是又一个奇迹，一个在九十岁时逢遇人生初恋的奇迹。

房子整理好后，我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了电话。神圣的上帝啊！她在听到我声音的那刻叫了起来，我以为你被淹死了呢。我真不明白，你和那姑娘又待了一晚上，怎么还是没碰她啊。你有权利不喜欢她，但是，至少你得表现得像个成人啊。我本想跟她解释一下，但她直接跳到了另一个话题上：不管怎样，我帮你看上了另一个稍微大点儿的，很漂亮，也是个处女。她爸爸想拿她换套房子，但是咱可以谈下个折扣。我的心被冻住了。完全不需要，我惊恐地抗议道，我想要原来那个，一切照旧，没有失败，没有争吵，也没有糟糕的回忆。我们在线上沉默了许久，最后她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用恭顺的声音说：好吧，这应该就是医生说的老年痴呆症吧。

晚上十点我去了那里，载我的司机以罕见的不问问题的美德著称。我带了一台便携式风扇、一幅奥兰多·里韦拉^③——亲爱的“小人物”——的画，还有用来挂它的锤子和钉子。我们在半路上停了一次，我去买了牙刷、牙膏、香皂、花露水和一些甘草片。我本来还想带一个

好点儿的花瓶和一束黄玫瑰过去，好把纸花的乏味气息驱散，但没找到一家还开着门的花店，只好去别人的私家花园里偷了一束刚开的六出花。

根据老鸨的指示，从那次起我便开始走水渠旁的后街，这样就没人会看到我从果园的大门进去了。司机提醒我道：小心，学者先生，在那栋房子里，她们可是会杀人的。我回答他道：若是为了爱就不要紧。庭院处在一片黑暗中，但窗户却透着生命的光亮，从六间屋子里传出纷乱混杂的曲调。我房间内的音乐声最大，我听出了堂佩德罗·巴尔加斯^①——美洲男高音——热情的嗓音，他正在唱米盖尔·马塔莫罗^②的博莱罗曲。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带着紊乱的呼吸，我推开门，看到了床上的黛尔加迪娜，与我记忆中的她一样：裸着身体，在神圣的平安里，向心脏的那一边侧卧着。

在躺下之前，我整理了梳洗架，用新风扇替下了生锈的那台，还把画挂到她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的地方。我在她身边躺下，一寸一寸地观察着她。她就是那个在我家中走动的姑娘：同一双在黑暗中依靠抚摸来熟悉我的手，同一双能踏出猫一般轻盈步伐的脚，同一种留于我床单的汗液味道，还有那同一根戴着顶针的手指。无法想象：看着她、摸着她有血有肉的身体，让我觉得她比我记忆中的更不真实。

正前方的墙上有一幅画，我对她说。是“小人物”画的，我们都很爱他，他是妓院有史以来最好的舞蹈演员，心肠好得会同情魔鬼。他用刷船的油漆画的这幅画，画笔是用他那只狗的毛自制的，画布则来自坠落在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中的飞机上烧焦的帆布。画上的女人是他从一个修道院里绑来做老婆的修女。我给你挂在这儿，这样它就会成为你醒来时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当我在子夜一点熄灭灯光时，她没有改换姿势。她的呼吸太过微弱，我甚至摸了摸她的脉搏来确认她还活着。血液带着歌曲的舒畅在她的静脉中流淌，分路而行，直至她身体最隐秘的域界，被爱净化之后又回到了心脏。

黎明时分离开前，我在一张纸上画下了她的掌纹，而后把它交给女巫萨希比解读，好让我洞悉她的灵魂。女巫是这样说的：她是一个心口如一的人。极为擅长做手工。她与已逝的某人有接触，希望从后者那里得到帮助，但是她还不明白，她所寻找的帮助就在身边。她还没有和人发生过关系，但是会结婚，最终在很老时死去。现在她身边有个深色皮

肤的男人，但他并不是她此生的归宿。她本可以有八个孩子，但会决定只要三个。三十五岁时，如果她能依照心意而不是理性行事便能赚得大钱，四十岁时还会得到一笔遗产。她会去很多地方。会有双重生活也会有双重运气，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出于好奇，她喜欢尝试一切，但如果不跟随心的指引，她将来会追悔莫及。

深受爱情折磨的我把暴风雨带来的灾难抚平后，又借此机会做了这些年来因欠债和怠惰拖延下的许多修复工作。我重新整理了书房，按照读过的顺序把书摆好，最后还把自动钢琴连同上百张古典乐曲纸卷当作历史文物卖掉了。我买了一部唱机，是二手的，但比我原来的那个要好，有高保真扬声器，仿佛把家里的空间都扩得更大了些。我已处在毁灭边缘，但在这个年纪仍活着已经是个奇迹，我很知足。

房子从废墟中重生了，而我则怀着一种此生从未体会过的强烈情感和幸福在黛尔加迪娜的爱中飘游着。因为她，我在生命中第九十个年头过去时第一次面对了自己的本性。我发现我那让每样东西都回归其位、每种事物都遵循其时、每个用词都符合其韵的偏执并不是有序思维的奖赏，与之相反，它是一整套由我发明的假象系统，为的是掩盖我天性中的混乱无序。安分守己并不是我的美德，而是一种对抗粗心大意的反应，我表现得慷慨是为了遮掩我的吝啬，我装作谨慎克己因为我满脑子恶念，我温和是为了不向自己被压抑的怒火屈服，我守时只是为了掩饰他人的时间对我来说多么不重要。总而言之，我发现爱情不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是黄道十二宫的一个星座。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试着重读那些在我年少时曾引领我的名著经典，但却读不下去。我陷入了那些当年母亲试图硬塞给我却遭我鄙夷的浪漫字句，通过它们，我才意识到，推动世界前进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并不是那些幸福的爱情，而是那些让人痛苦的爱恋。当对音乐的品位出现危机时，我发觉自己又老又落伍，于是向随意放纵的欢愉敞开了心扉。

我自问怎么可以屈服于这种我自己激发起来而又为之恐惧的永恒的晕眩。我在飘忽不定的云朵间浮游，怀着弄清自己是谁的虚妄幻想在镜前与自己交谈。我的精神错乱不堪，以至于在一次石块水瓶乱飞的学生游行中，我竭尽全力才没有举着一块使我的真实境况——我为爱痴狂——变得神圣的牌板冲到最前面去。

睡梦中的黛尔加迪娜无情的召唤让我失去了理智。我改变了周日专栏的宗旨，但并无丝毫恶意。无论什么主题，我都为她而写，在文中，

我为她笑为她哭，我的生命从每一个词语中流过。我不再以一直以来的传统的短讯形式完成专栏，而是写成了一封封属于每个人的情书。我向报社建议文章不要用活字铸排机排印，而要用我的佛罗伦萨手写体发表。对主编来说，这当然是另一个带有老年人的虚荣心的提议，但社长却用一句至今仍在编辑部广为流传的话说服了他：

“请您不要搞错了：性格温和的疯子正在引领未来。”

公众的反应迅猛而兴奋，恋爱中的读者寄来了大量信件。一些人通过那些同时也播报紧急事件的广播新闻栏目收听我的专栏，还有人用油印的方法或是用复写纸做出拷贝，像走私香烟一样在圣布拉斯大街的街角贩卖。这些专栏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服从于我自我表达的欲望，但我还是如从前一般在写作时充分斟酌，永远用一个年过九十却未曾学会像老人一样思考的男人的口吻来叙述。与往常无异，知识界仍旧犹疑不决、意见不一，甚至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笔迹学者也为他们关于我字体的游移不定的分析而卷入了论争。正是这些人分散了注意力，炒热了争议，把怀旧引入了时尚。

年终前我已经和罗莎·卡瓦尔卡斯说好，要她留下房间里的那台电扇、梳洗架上的用品，以及将来我为了把它装点得更加宜居而可能带去的任何东西。我会在十点到达，总是带几样新东西给她，或是给我们俩，会花几分钟时间拿出隐藏的道具，来布置我们的夜间剧场。临走前——从来都不会晚于五点——我会再确认一遍一切都被收起锁好。而后，卧房便会恢复它原本的、为那些散客的悲伤爱欲而准备的萧索模样。一天早上，我听到马可斯·佩雷斯在他那档听众最多的清晨节目中，说他决定在每周一的新闻播报中朗读我的专栏。我尽力压抑住恶心，惊恐地说：知道了吧，黛尔加迪娜，名气是一位很胖的女士，她不和你睡觉，但当你醒来的时候，她永远都在床边看着你。

那些日子中的某天，我留下来和罗莎·卡瓦尔卡斯一起吃了早饭，尽管还在严格服丧，那顶黑色圆帽遮住了她的眉毛，但她不再显得那么苍老了。她的早餐以丰盛著称，还配上了足足的辣椒，让我哭了出来。在咬下第一口烈火时，我便泪流满面地对她说：今天晚上不需要圆月出现，我的屁股就能着火了。别抱怨，她说。感谢上帝啊，要是能着火说明你还有屁股。

在我提到黛尔加迪娜这个名字时她吃了一惊。她不叫这个，她说，她叫……别告诉我，我打断了她，对我来说她就是黛尔加迪娜。她耸了耸

肩：好吧，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像利尿剂。我告诉她小姑娘在镜子上写下的关于老虎的字句。不可能是她，罗莎说，她不识字。那是谁呢？她耸了耸肩：可能是哪个死在那间房里的人吧。

我利用那些早餐的机会向罗莎·卡瓦尔卡斯倾诉衷肠，同时请她帮些小忙照顾黛尔加迪娜，好让她过得更好也更漂亮。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语气中带着女学生的淘气。太可笑了！她总这么对我说，我觉得你就像在让我帮你跟她求婚似的。既然说到这儿了，她突发奇想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啊？我一时愣住了。说真的呢，她坚持问道，对你来说这样更便宜。说白了，你这个年龄的问题，就是能用还是不能用，但你跟我说过你还很威猛呢。我打断她说道：性是一个人在不能得到爱时给自己的安慰。

她抖出一串大笑：哎哟，我的学究，我一直都知道你很男人，你一直都是，我真为你高兴，当你的敌人们都缴械了的时候，你还是没变。怪不得大家都在谈论你，你听到马可斯·佩雷斯怎么说的了吗？我想结束她的话题，便对她说，全世界都听到了。但她还是坚持说道：还有卡马丘·依卡诺教授，昨天在《闲话天下事》栏目中，他说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了，因为没剩几个像你这样的男人了。

那个周末我发现黛尔加迪娜发烧了，还不停咳嗽。我叫醒了罗莎·卡瓦尔卡斯，请她给我些家用药，她把一个急救小药箱带到了屋里来。两天后黛尔加迪娜的身体仍然很虚弱，还不能回去做缝扣子的工作。医生给她开了治普通流感的家用药方，说能让她在一个星期内退烧，但她整体营养不良让他担忧不已。我不再见她，忍受着思念之苦，借此机会布置了一下没有了她的房间。

我带去了一幅塞茜丽娅·波拉斯为阿尔瓦罗·塞贝达名为《我们都在等待》的故事集所作的钢笔画。还带去了六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好帮我度过那些无眠的夜晚。因此当黛尔加迪娜可以重回房间时，她会发现里面透着一种安稳的幸福：被清香杀虫剂净化过的空气、粉红色的墙壁、柔和的灯光、插在花瓶中的鲜花、我最喜爱的书，以及按照时兴的风格，以特别方式挂起来的我母亲的美丽画作。我换了一部能收到短波信号的新收音机，并将它永远地固定在高雅音乐节目频道，这样黛尔加迪娜便可以学着在莫扎特四重奏的陪伴下入眠了，不过有一晚我发现收音机被调到了某个专门播放流行博莱罗舞曲的台。毫无疑问，这是她喜欢的，我接受了这点，也没有难过，因为我在最好

的年华也曾全心全意地爱过这种音乐。第二天，在回家之前，我用口红在镜子上写道：我的小姑娘，在这世上我们两个孤单做伴。

那段日子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先于她的年龄快速地成熟起来了。我把这感觉告诉了罗莎·卡瓦尔卡斯，但对她来说，这很正常。到十二月五号她就满十五岁了，她对我说。完完全全的射手座。过生日这种事太过真实，让我不安起来。我能送她什么呢？一辆自行车，罗莎·卡瓦尔卡斯说。为了去缝扣子，她每天要横穿城市两次。她带我到后屋看了看小姑娘骑的自行车，它看起来实在是件不体面的破烂儿，与这样一个被深爱的女人极不相配。然而，这个能证明黛尔加迪娜存在于真实生活的可触碰的证据也让我感动不已。

去给她买最好的自行车时，我没禁住诱惑，试骑了一下，在卖场的斜坡上随意地转了几圈。当售货员问起我的年龄时，我带着老年人的卖弄说道：就快九十一了。他的回答正合我意：您看起来要年轻二十岁。我也不知自己为何仍保持着这种学生的技能，只觉得周身充满了明晃晃的愉悦。我唱起了歌。最开始是低声哼唱，唱给自己听，随后便开始带着伟大的卡鲁索^註的骄傲，在纷攘的集市里、在公共市场疯狂的车辆间放声歌唱。人们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冲我喊叫，鼓动我坐在轮椅上参加环哥伦比亚自行车赛，我一边唱，一边像个幸福的水手那样向他们招手致意。那个星期，为了纪念十二月的到来，我写了另一篇大胆的专栏：《九十岁时怎样在自行车上收获快乐》。

黛尔加迪娜生日当晚，我为她唱了整首生日歌，吻遍她的全身，直到自己无法呼吸时才停下：脊椎，一节一节椎骨，一直到她消瘦的臀部；长了痣的身体这一侧，她永不枯竭的心脏的那一侧。在我亲吻她时，她身体的热度在上升，同时散发出一种山野的香气。她用每一寸肌肤新生的颤动来回应我，而我在这每一寸肌肤里发现了不同的热度、独特的味道和崭新的呻吟，她整个身体内部发出了和弦的共鸣，她的乳头未被触碰便如花朵般绽开了。即将在凌晨睡去时，我听到海上传来人群的嘈杂声响，感受到一阵穿过我心脏的林间的恐慌。我走进浴室，在镜子上写下：黛尔加迪娜，我的生命，圣诞节的微风已经来了。

我最快乐的记忆之一发生在与那天相似的一个早上，当时我正要离校，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我怎么了？老师迷惑地说：哎呀，孩子，你没看到起风了吗？八十年后，当在黛尔加迪娜的床上醒来时，我又有了这种感觉，是同样的十二月带着它明澈的天空，它的沙尘暴，以及它在街

上吹飞屋顶、掀起女学生裙摆的旋风准时回来了。在这个时节，城市获得了一种鬼魅的回响。在刮着微风的夜晚，人们甚至可以在最高处的街区听到公共市场里的叫喊声，仿佛它们就发自拐角处。十二月的狂风常常能让我们顺着朋友的声音找到散落在遥远妓院中的他们。

然而，坏消息也随风而至，黛尔加迪娜不能与我共度圣诞了，她要与家人一起过。如果说在这世上有什么我厌恶的事，那就要数那些强制性的节日了，人们因为幸福而哭泣，焰火、呆板的圣诞歌谣、皱纹纸扎成的花环，一切都与两千五百年前出生在一个简陋马厩里的婴孩没有丝毫关系。然而，当那个夜晚到来时，我还是没能抵挡住思念，去了没有她的房间。我睡得很好，醒来时身旁放着一只毛茸茸的玩偶熊，像北极熊似的用两条后腿站立，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给我的丑爸爸。罗莎·卡瓦尔卡斯之前告诉过我，黛尔加迪娜正通过我在镜子上写下的课程学习读写，她漂亮的字体令我惊喜，但老鸨却用一个坏消息击碎了我的幻想：那只熊是她送的礼物。于是新年前夜我留在自己家，八点钟就上了床，然后毫无痛苦地睡着了。我感到幸福，因为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在连续而愤怒的敲击声间，在工厂和消防车的警报声里，在航船的叹息以及鞭炮和烟火的爆炸声中，我感觉黛尔加迪娜踮着脚尖走了进来，躺在我的身边，给了我一个吻。那么真实，在我的唇上留下了她的甘草味道。

四

新年伊始，我们便开始对彼此有了熟悉之感，仿佛两人清醒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已经小心地拿捏到了一种语气，让她听到却不吵醒她，而她会用自然的身体语言来回应。可以从她睡觉的方式看出她的精神状态。一开始是疲累而暴躁的，慢慢地，内心趋于平和，让她的容貌更美，梦境更丰饶。我向她讲述我的生活，在她耳边诵读我周日专栏的初稿，不用说，她就在文中，文中只有她。

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我在她枕边放了一副原先属于我母亲的祖母绿耳环。在下次见面时她便戴上了，可它们并没能把她衬得更美。而后我按照她的肤色给她配了另一对更适合她的耳坠。我跟她解释：我最先带给你的那一副同你的气质和发型不相配，这两枚你换上就好多了。接下来的两次见面中，她没有戴其中的任何一对，但在第三次时，她戴上了后来那对。于是我开始明白，她并不服从我的命令，但是会等待时机取悦我。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习惯了那种家庭生活，甚至都不再裸睡，而是穿起了中国丝绸的睡衣裤——之前，在没有了能为之而脱的对象后，我就再也没穿过它。

我开始给她读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全世界都比法国人更加热爱这位法国作家。那是第一本讨她喜欢又不会吵醒她的书，我不得不连续两天去那里，为她读完了它。接下来我们又读了佩罗^①的《故事集》、《圣经故事集》，以及专门为儿童编辑的洁本《一千零一夜》。从一篇与另一篇之间的差别中，我发觉，小姑娘的睡梦会随她对所读内容的兴趣而变得或深或浅。当我感觉她已触到最深处时，便会熄掉灯光，把她抱在怀里睡去，直到公鸡开始鸣叫。

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幸福，幸福到会吻她的睫毛，轻轻地吻，直到某个晚上，仿佛空中划过的一道光芒：她第一次笑了。过了会儿，她毫无

缘故地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对着我，略带不悦地说：让蜗牛哭的人是伊莎贝尔。我幻想着我们能进行对话，并为之兴奋不已，于是用相同的语气问她：是谁的蜗牛呀？她没有回答。她的声音有种平庸的味道，仿佛发出它的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携带于体内的另一个人。所有的疑影都在那一刻从我的灵魂中消失了：我还是更喜欢睡着的她。

我唯一的麻烦就是那只猫。它食欲不振、孤僻冷漠，连着两天缩在它惯常待的角落里，连头也不抬，当我想把它放入柳条篮子，好让达米亚娜带它去看兽医时，它如受伤的野兽一般给了我一爪。她勉强缚住了它，然后把它装进一个龙舌兰叶编成的袋子里，虽然它在里面暴怒挣扎，还是被带走了。过了一会儿，她从养殖场打来电话，告诉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把它杀了，他们需要我批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很老了，达米亚娜说道。我怒气冲冲地想，他们也能把我吊在挂满猫的火炉里活活烤死。我夹在两团火间，毫无抵抗之力：我不曾学会喜欢猫，但也没有到因为它老了就能狠心杀了它的程度。手册上的哪句话是这样指导的？

我被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不禁提笔为周日专栏写了一篇文章，还从聂鲁达的诗句中偷来了一个题目：“猫是客厅中的小老虎吗？”。专栏引起了一场新的纷争，再一次把读者分为两派：支持猫的和不支持猫的。五天后，以下理论获得了最终胜利：为了保障公众健康而杀掉猫是合理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它太老就干这种事则是不合宜的。

母亲去世后，我总觉得有人会趁我睡着时来碰我，这可怕的想法让我失眠。一天夜里我感觉到了她，但她的声音却把宁静还给了我：我可怜的儿子啊。②某日凌晨，在黛尔加迪娜的房间中，我再一次感觉到有人碰我，于是高兴地扭了一下身体，以为是她碰了我。但不是：是黑暗中的罗莎·卡瓦尔卡斯。穿上衣服，跟我来，她对我说，有个严重的问题。

的确，而且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在庭院的第一个房间中，她最大的一个客户被刀刺死了。凶手已经逃走。庞大、赤裸、还穿着鞋的尸体倒在被血浸湿的床上，苍白如一只蒸鸡。进门时我便认出来了：那是J.M.B.，一位大银行家，以文雅、和蔼、上佳的穿衣品位，尤其是他家房子的简约风格而闻名于世。他的颈上有两道仿佛嘴唇一般的紫红伤痕，腹部有一道沟壑，仍血流不止。他的身体也还未僵直。比起那些伤口，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他还戴着安全套，看上去还没来得及用，那

场性爱便被死亡打断了。

罗莎·卡瓦尔卡斯不知道他是和谁一起来的，因为他也有从果园大门进来的特权。不排除他的同伴是另一个男人的可能性。老鸨请我帮她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给尸体套上衣服。她那么平静，让我不禁产生了不安的念头：对她来说面对死亡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没有什么比给死人穿衣服更难的了，我对她说。我以前干过这个，她回答，如果有人帮我固定他会很容易。我让她再想想：一具被戳得遍体鳞伤的身体穿着一件完好的英式礼服，谁会信呢？

我为黛尔加迪娜担起心来。最好的办法是你把她带走，罗莎·卡瓦尔卡斯对我说。除非我死，我说道，只觉口中一阵寒气。她察觉到了这一点，难掩轻蔑地对我说：你在发抖！这是为了她好，我说道，虽然这话只有一半是真的。告诉她要在任何人到来前离开。好的，她说，不过你是记者，不会有事的。你也一样，我带着某种怨恨说道，你是这个政府里唯一说话管用的自由党人。

这座城市因有着平和的自然环境和与生俱来的良好治安为许多人憧憬，但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起惊人而残忍的谋杀案。妓院里的这起还排不上号。官方报道的标题夸张耸动，细节却少之又少，只说年轻的银行家在普拉多马尔公路上遇到了动机不明的歹徒的袭击，被刺身亡。他没有敌人。政府发言官指出嫌犯是那些国内流亡者，他们正在掀起一股违背城市公民精神的犯罪浪潮。头几个小时里，就有超过五十人被捕。

我无比震惊，去找司法编辑。他是典型的二十年代记者，戴着绿色树脂帽檐的帽子，袖口还有松紧带，自以为能猜准事实。但关于这桩案子他只知道一些零散线索，而我则不失严谨地对之进行了最大可能的补充。于是，我们四手联合，写出了五页文稿，准备以一共八栏的报道形式发表在头版，并将之归功于那个消息来源完全值得我们信赖的永恒幻影。然而那位审查官，那位可恶的九点先生眼都不眨一下就搬出了官方版本，声称那是一次自由派暴徒的袭击。于是我愁眉苦脸地参加了本世纪最恬不知耻也最熙攘拥挤的葬礼，以此净化自己的良心。

那晚我回到家后就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拨了电话，想知道黛尔加迪娜怎么样了，但是一连四天她都没有接。第五天，我咬紧牙关去了她家。大门被封住了，封它的不是警察，而是卫生保健局。住在周围的人提供不了任何消息。没有关于黛尔加迪娜的任何线索，于是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有时可笑的、让人焦虑不已的寻找。我会整日整日地待在一

座尘土飞扬的公园里，坐在长椅上观察那些骑车的女孩子，旁边的孩子们则会爬上掉了漆的西蒙·玻利瓦尔塑像，把这当作游戏。她们像母鹿般蹬着踏板骑过去：美丽，未被占有，做好了在“瞎母鸡”游戏中被抓的准备。当所有希望都消逝的时候，我便躲进博莱罗舞曲的平静中。它仿佛毒药一般：每一个词语都是她。从前我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才能写作，因为我的注意力更容易被音乐而不是文字吸引。但那时却反了过来：我只有在博莱罗舞曲的庇荫下才能书写。我的生活被她充满。那两个星期的专栏都是情书的暗语范本。面对雪崩一般的来信，主编很不愉快地请求我在思考如何安慰这么多恋爱中的读者的同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

缺乏安宁的状态结束了我严苛守旧的生活。我在五点醒来，但仍会躺在房间的黑暗中想象黛尔加迪娜在她不真实的生活里的样子，她会叫弟弟妹妹起床，为他们穿上上学的衣服，照顾他们吃早饭，然后骑上车穿过城市去受缝扣子的刑罚。我不禁惊愕地自问，一个女人在缝扣子时会想些什么呢？她会想我吗？她也会去找罗莎·卡瓦尔卡斯问我的消息吗？整整一星期我昼夜都穿着连身工装裤，不洗澡、不剃须、不刷牙，因为爱情太晚才教给我，一个人是为了某个人才梳妆、打扮、喷上香水的，而我之前从未拥有过这样一个人。当达米亚娜在上午十点撞见我裸身躺在吊床上时一定觉得我生病了。我用被欲望搅浑的眼睛看着她，邀她脱光衣服和我滚在一起。她轻蔑地对我说：

“您想过如果我说‘好’之后您要干什么吗？”

这时我才知道这种折磨已经把我腐蚀到了何种程度。在这青春期的伤痛中我已辨认不出自己了。因为怕错过电话，我不再出家门。我埋头写作，不去碰听筒，每次铃声一响就冲过去接，想着可能是罗莎·卡瓦尔卡斯。每一秒我都有可能停下手中的事打给她，就这样，我坚持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明白那是一部没有心的电话。

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当我回到家时，看到猫正蜷在门前的石阶上。它脏乎乎、惨兮兮的，透着让人心疼的温顺。手册上告诉我它病了，于是我开始按照上面的指导来照顾它。接着当我正迷迷糊糊地睡午觉时，突然间，一个念头让我醒了过来：它也许可以把我带到黛尔加迪娜的家去。我把它装在一个购物袋里去了罗莎·卡瓦尔卡斯的店门口，那里仍旧被封着，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猫在口袋里挣扎得异常猛烈，终于逃了出去，它跳上果园的土墙，消失在树木间。我用拳头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只听见一个军人的声音问道：谁在外面？一个好人，我理直气

壮地说道，我是来找老板的。这儿没有老板，那个声音说。那至少开开门让我把猫捡回来吧，我坚持道。没有猫，他说。我问：您是谁？

“谁都不是。”那个声音说。

从前，我一向觉得为爱而死不过是诗歌的特权。那个下午，当我在没有了猫也没有了她的境况下回到家里时，我证明了人不但可能为爱而死，而且我，老迈的、不拥有任何人的我正在为爱死去。但我也意识到，与之相反的同样是事实：我不会为了世上的任何东西放弃我这受苦的快乐。我花费了十五年时光翻译莱奥帕尔蒂^註的诗歌，但直到那天下午才深切地理解了它们：可怜的我，如果这是爱，有多么的折磨。

胡子拉碴的我穿着连身裤走进报社，这引起了关于我精神状态的种种猜测。整修后的房子有一个个玻璃隔间，还有从天窗洒下的光线，看上去像个产科医院。人造的安静而舒服的氛围邀请人们低声交谈，蹑脚行走。门厅里挂着三任终身社长的油画画像——像极了那些死去的总督——和他们同名人访客的合照。宏伟的主厅里最抢眼的是一张在我生日那天下午拍的编辑部的巨大合影。我不可避免地在脑海中把这一张与我三十岁时所拍的那一张做了比较，于是再一次怀着恐惧验证：人在照片里会比在现实中显得更老、更凄惨。在生日那天下午曾亲吻过我的女秘书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了不让她当真，我很幸福地告诉了她实话：我在为爱生病。她于是说：真遗憾不是为了我！我礼貌地答道：您别这么肯定嘛。

司法编辑从他的隔间里走出来喊道，在市歌剧院发现了两具身份不明的女孩的尸体。我惊恐地问他：多大年龄？很年轻，他说，可能是被当局的暴徒们追赶至此的国内流亡者。我舒了口气。紧张局势像血迹一样默默地侵入咱们这儿了，我说。在我走远时司法编辑喊道：

“不是血，大师，是屎。”

几天后，当一个女孩挎着与那只猫篮相同的篮子，如一阵寒战般从世界书店前走过时，更可怕的事发生在了我身上。我在人群里、在正午十二点的喧闹中紧紧地跟着她。她很美，步子很大，自如流畅地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路，我用尽全力才赶上了她。终于，我超过了她，想从正面看看她。她一手把我拨开，没有停，也没有道歉。她不是我想的那个人，但她的高傲让我心痛，仿佛她就是她一样。那时我才明白自己不可能认出清醒且穿着衣服的黛尔加迪娜。而她也不可能知道我是谁，因为

她从来都没有见过我。我疯狂地在三天内织出了十二双蓝色和粉色的婴儿袜，试图给自己勇气，不听、不唱，也不去记起那些能让我想到她的歌曲。

事实上，我已经魂不守舍了，而且因为自己面对爱情时的苍弱无力，我开始真正意识到衰老的问题。当一辆公共汽车在商业中心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卷进车下时，我拥有了一个更加戏剧化的证据。人们刚刚把她送入救护车，而那场悲剧的惨烈程度可以从自行车在那摊血泊中所呈现的废铁样子上看出。但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却不是那辆自行车的毁坏程度而是它的牌子、型号和颜色。那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我送给黛尔加迪娜的那辆。

所有目击者都声称受伤的骑车女孩非常年轻、高挑、纤瘦，留着短短的髻发。惊惧之下，我坐上了第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去了慈善医院。那是一栋非常老旧的楼，赭红色的墙壁让它看上去像一座困在沙地中的监狱。我花了半小时才进去，然后又花了半小时才从一个瓜果飘香的庭院离开，一个不幸的女人在那里把我拦了下来，盯着我的眼睛冲我嚷道：

“我是你不找的那个人。”

这时我才记起，这个地方是来自市疯人院的无暴力倾向病人的居住地，他们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在医院前台，我不得不摆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好让一个护士把我带到急救室去。入院病历上写着：罗莎尔瓦·利奥斯，十六岁，职业不详。诊断：脑震荡。预后：观察。我问了问急救室负责人是否可以看看她，虽然我的内心希望他说不，但他们还是很乐意地带我进去了，为的是让我写一写这所医院被抛弃的现状。

我们穿过一间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屋子，那里弥漫着浓烈的苯酚味儿，床上躺满了惨不忍睹的病人。最里面是一个单间，金属推车上的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她的头上缠满绷带，面部青紫、肿胀，已经无法辨认，但我只看了看脚，便确定那不是她。这时我才突然想到问自己：如果是她我该怎么办？

第二天，仍被夜晚的蛛网缠绕着，我鼓起勇气去了罗莎·卡瓦尔卡斯曾提过一次的小姑娘工作的工厂，请求厂长带我参观一下设备，好把它推介成联合国洲级项目的典范。那是个皮肤肥厚的沉默的黎巴嫩人，他怀着成为世界榜样的幻想，为我打开了他王国的大门。

三百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额头上顶着星期三的圣灰在明亮而空旷的车间缝着扣子。当看到我们走进去时，她们像女学生一样站了起来，斜着眼偷偷地观察我们，经理则在一旁向我们介绍他对古老缝扣艺术的贡献。我仔细地打量着她们每个人的面孔，生怕认出了着衣的、清醒的黛尔加迪娜。但却是她们中的一员带着崇拜的可怕眼神无情地先认出了我：

“告诉我，先生：您是在报纸上写情书的那位吗？”

我从未想过，一个睡着的姑娘可以在我身上引发这样的灾难。我逃出那家工厂，没有道别，也没有去想如果那座炼狱中的那些处女之一正是我要找的人该怎么办。走出那里时，我的生命所剩的唯一感觉就是哭的欲望。

罗莎·卡瓦尔卡斯在一个月后打来电话，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在银行家被谋杀后，她去西印度卡塔赫纳度过了一个她应得的假期。我不信她，当然不信，但还是对她的好运气表示了祝贺，任由她随意扯了会儿谎，然后才问了她那个在我心中翻滚的问题：

“那她呢？”

罗莎·卡瓦尔卡斯沉默了好一阵儿。她就在那儿啊。最后她这么说道，声音却支吾不清：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多久？不知道，我会通知你的。我觉得她要挂电话了，便硬生生地把她拦下来：你等一下，给我一点儿提示。没有提示，她说，把话头截断：小心点儿吧，你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尤其可能伤害到她。我可不想听这种遮遮掩掩的话。我向她哀求，希望得到哪怕一个接近真相的机会。不管怎样，我对她说，咱们俩是同谋。她没有再把话说深。你冷静点儿，她对我说，小姑娘挺好的，等着我给她打电话呢，但现在没什么可做的，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再见。

我握着电话，不知所措。我很了解她，知道如果她不想给，我从她那里什么都得不到。比起理性，当时我更相信运气，于是下午，我悄悄地去了她的妓院，看到大门仍旧被卫生保健局封着。我想罗莎·卡瓦尔卡斯是从别的地方打给我的，也许是从别的城市，单单这一个念头就让我被混乱的预感填满了。然而到了下午六点，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她在电话里说出了我的暗语。

“嗯，就是现在了。”

晚上十点，我带着几盒瑞士巧克力、一些杏仁糖和别的糖果，以及一篮用来铺满床的火红的玫瑰战战兢兢地去了那里，我一直紧咬着嘴唇，免得自己哭出来。门半开着，灯亮着，收音机里依稀传来勃拉姆斯的第一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床上的黛尔加迪娜是那么光彩照人、那么不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她来。

她长大了些，但这并不是从她的个子，而是从一种令她似乎大了两三岁的强烈的成熟感上看出来的，而且，她比从前更赤裸了。她高高的颧骨、被海上烈日灼烤的肌肤、纤薄的嘴唇以及鬈曲的短发为她的容貌灌注了普拉克西特列斯^①的阿波罗那般雌雄同体的光芒。但不可能认错了人，因为她的乳房已经长到我不能一手握住的大小，腰身也已成形，骨骼亦更加结实匀称。我喜爱这些自然而健康的生长，但那些人为的矫饰让我晕眩：假睫毛、涂上珠光甲油的手指甲脚指甲，还有与爱情毫不相关的廉价香水。然而使我失去理智的却是她戴在身上的财富：镶绿宝石的金耳环、天然珍珠项链、缀满璀璨钻石的金手镯，以及套在每根手指上的真宝石戒指。椅子上放着她镶有薄片、满是刺绣的晚礼服和一双缎面的鞋子。一股非同寻常的怒火从我的脏腑中蹿了上来。

“婊子！”我喊道。

恶魔向我耳中吹进了一个恶毒的想法。那就是：罪案发生当晚，罗莎·卡瓦尔卡斯应该没有时间也没有平静的心绪去提醒小姑娘如何应对，于是警察在房间里找到了她：独自一人，不够年龄，没有不在场证明。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像罗莎·卡瓦尔卡斯这样处理事情：她把小姑娘的贞洁卖给了某个大佬客户，以换得她在案件中的清白。首先要做的，当然，就是在丑闻平息之前消失。多美妙啊！一次三人蜜月，他们两个在床上，而罗莎·卡瓦尔卡斯则在一个奢华的露台上享受着逍遥法外的幸福。在盲目的暴怒之下，我把房间内的所有东西一件一件地砸到了墙上：灯、收音机、电扇、镜子、罐子、杯子。我不慌不忙地砸着，但也没有停歇，在碎裂的巨响和有条不紊的陶醉中，我的生命被赎了回来。小姑娘在第一件东西摔碎时就吓了一跳，但她没有看我，而是蜷成一团，背对着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显出时断时续的惊惧，直到响声终止。院里的母鸡和凌晨的狗让气氛变得更加混乱难堪。当罗莎·卡瓦尔卡斯穿着睡衣的冷漠身影出现在门口时，暴怒所发出的刺眼光芒令我突然有了一个终极想法，那便是放火把房子烧掉。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用眼睛清点了一下灾难损失，又确认了小姑娘的状况——她像

蜗牛一般蜷着自己的身体，把脑袋埋在手臂间：虽惊惧万分，但毫发无损。

“我的上帝啊！”罗莎·卡瓦尔卡斯喊道，“为了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是我不会为你做的呢！”

她用一种悲悯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命令我道：咱们走吧。我跟着她走到她的屋子，她默默地给我倒了一杯水，示意我坐在她对面，准备好听我坦白。好，她说，现在你得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给她讲了我想象中被揭示的真相。罗莎·卡瓦尔卡斯安静地听完了，她没有惊讶，到最后反而像是受到了启发。真奇妙啊，她说，我总是说忌妒比真理知道得更多。然后她便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事实。的确，她说，罪案发生那晚她头晕目眩的，把在屋里睡着的小姑娘忘记了。她的一个客户，同时也是那个死者的律师，与她一起分发了好处和贿赂，并邀请罗莎·卡瓦尔卡斯在丑闻平息之前去了西印度卡塔赫纳的一座度假酒店。相信我，罗莎·卡瓦尔卡斯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和小姑娘。我是前天回来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小姑娘倒是立刻就过来了，她的状况太差了，于是我为你给她洗了澡，为你帮她穿好衣服，还带她去了美容院，命令他们像打扮女王一样打扮她。你也看到了效果怎么样：完美。至于那件奢华的衣服？那是我的，我那些最穷的姑娘需要和客户一起去跳舞时，我就租给她们一件这样的礼服。那些珠宝呢？也都是我的，她说：摸一摸就知道了，那些钻石是玻璃的，铆钉是白铁的。所以你就别在这儿折腾啦，她总结道：去，把她叫醒，跟她道个歉，和她来一次。没有人比您二位更值得幸福了。

尽管我尽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去相信她，但爱情还是战胜了理性。婊子们！我感到五内俱焚，对她嚷道。这就是你们，我吼道：狗屎妓女！我不想再知道关于你、关于世界上其他娘儿们的任何事了，尤其是关于她的。我在门口冲她做了一个手势：永别了。对此罗莎·卡瓦尔卡斯毫不怀疑。

“永别了。”她带着苦涩的悲伤对我说，但随即又回到了她真实的生活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房里那乱摊子的赔偿单给你的。”

五

在读《三月十五日》^①时，我偶然发现了一句据作者说是尤利乌斯·恺撒所讲的阴险的话：一个人最终一定会变成他人心目中的那个他。我既没有在尤利乌斯·恺撒自己的作品中也没有在他的传记作者——从苏埃托尼乌斯^②到卡可皮诺^③——的著作里见过这句话，不过单是读到它就颇有价值。它的宿命主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用在了我的生命中，给予我我所需要的决心，使我不仅动笔写下了这本回忆录，还不知羞耻地从对黛尔加迪娜的爱写起。

我一刻也静不下来，茶饭不思，消瘦了很多，腰上连裤子都架不住了。我的疼痛在骨头里游窜，情绪无缘无故地变化；夜里，我头晕目眩，不能阅读也听不了音乐，而到了白天，我又总感觉疲倦乏味，整日打瞌睡却怎么也睡不着。

解脱从天而降。在一辆从洛玛·福莱斯卡开来的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位我没有看到上车的邻座乘客在我耳旁轻声问道：你还干吗？那是卡茜尔达·阿尔门塔，一个我曾时不时找她买春的老情人，从傲慢的少女时代开始，她便一直忍受着我这个孜孜不倦的顾客。退休之后，疾病缠身、身无分文的她嫁给了一个给了她名分、依靠、也许还有一点儿爱的中国菜农。七十三岁的她维持着原先的体重，仍旧美丽、强势，将她那个行业的大胆自如保持得完好如初。

她把我带去了她家，在沿海公路旁一座小山上的一片中国人的菜园里。我们坐在背阴露台的沙滩椅上，周围满是欧洲蕨、六出花的枝叶和挂在横梁上的鸟笼。可以望见在烈日下的山坡上戴着锥形草帽播撒菜种的中国农夫、灰嘴入海口^④，以及两道让河水分流入海的石砌防波堤。谈话间，我们看到一艘白色的远洋航船驶进了入海口，便沉默地望着它，直到它在内河港口发出悲凄公牛的呼号声。她叹息道，你发现了

吗，这是五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没在床上接待你。咱们都今非昔比了，我说道。她没有听我说，继续着她的话：你能想象得到吗，每次他们在广播里说起你的事时，每次人们因为喜欢你而称赞你，或者叫你恋爱大师时，我都会想，没有人像我这么了解你的魅力和你的狡猾。说真的，她说，没有人比我更能忍受你。

我不再硬撑。她也察觉到了这一点，看见了我被泪水浸湿的眼睛。她应该直到此时才发现，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而我，也靠着一种我从不自信会拥有的勇气一直望着她。我正在变老，我对她说。咱们已经老了，她叹了口气道，事实就是你并没有从内心感觉到老，但所有其他人都从外面看出来。

我不可能不对她敞开心扉，便将正灼烤我肺腑的那个故事和盘托出，从我在九十岁生日的前一天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一直讲到那个悲剧性的夜晚，我在房中摔东西，之后再也没回去。她听着我的倾诉，仿佛亲身经历了一遍，而后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最终笑了起来。

“做你想做的事吧，但别失去那孩子，”她对我说，“没有比孤独地死去更不幸的事了。”

我们坐着玩具似的像马一样慢的小火车去了哥伦比亚港。然后在木桩已经腐坏的码头对面吃了午饭，在灰嘴入海口被疏通之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从这里进入这个国家的。我们在一个棕榈叶搭顶的凉棚下坐着，壮硕的黑人主妇在这里为客人准备着烤鲷鱼配椰汁饭和青香蕉片。我们在午后两点的困倦中昏昏欲睡，却继续聊着，直到火焰般的巨大的太阳沉入海中。我觉得现实很梦幻。看看咱们最后在哪儿度的蜜月，她开玩笑说。随即又严肃下来：今天我回头去望，能看到千百个上过我床的男人排成的队，那时如果其中有哪个能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即使是最差的那个。感谢上帝，我及时遇见了我的中国人。那感觉就像嫁给了一根小拇指，但他是我一个人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衡量了一番我对她刚讲的话的反应，然后对我说：所以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可怜的孩子吧，即使忌妒告诉你的是真的，不管怎样，你已经跳过的舞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但是有一点，别耍老头子的浪漫。叫醒她，用那根魔鬼因你的懦弱和你的吝啬而赏给你的驴屎把她干到疯吧。说真的，她发自灵魂地总结道，你还没尝过带着爱情上床的美妙滋味呢，可别这样就死了。

第二天，在拨那个电话号码时我的手腕一直在抖。一方面是因为将与黛尔加迪娜重逢的紧张，另一方面是因为不确定罗莎·卡瓦尔卡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答。由于她给我在房间里造成的损失胡乱估价，我们大吵了一架。我不得不卖掉了我母亲最珍爱的画作之一，估摸着它应该值一大笔钱，但实际交易价格却不到我所期待的十分之一。我添上了自己剩余的积蓄，把钱带给罗莎·卡瓦尔卡斯，向她发出一个不容商榷的命令：你要么收下，要么干脆死心。这是一次自杀行为，因为她只需卖掉我的一个秘密便可以毁掉我的好名声。但她没有拒绝，同时也扣留下了我们争吵那晚作为抵押被她拿走的几幅画作。我是这盘棋绝对的输家：没有了黛尔加迪娜，没有了罗莎·卡瓦尔卡斯，也没有了我最后的积蓄。然而，我听着电话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最后她接了：喂？我发不出声音来。我挂断了。然后躺到吊床上，试着在萨蒂^①节制的抒情音律中恢复平静，我出了很多汗，把麻布都浸透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有勇气再次打过去。

“嗯，女人，”我用坚定的声音说，“就是今天了。”

而罗莎·卡瓦尔卡斯，当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哎哟，我忧郁的学究，她带着不可战胜的精气神儿叹了口气道，你消失了两个月，回来就想找乐子。她对我说她从一个多月前就再也没见过黛尔加迪娜，小姑娘好像已经从我砸东西的惊吓中完全恢复了，甚至都没有再谈起这事，也没有问起我，她找到了新工作，做得很愉快，比缝扣子要轻松惬意多了，还有更高的收入。一股烈火点燃了我的五脏六腑。只可能是做婊子，我说。罗莎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你别这么无礼，如果是的话她就在我这儿了。还有哪里能比这儿更好？她脱口而出的逻辑加深了我的怀疑：我怎么知道她不在那儿？这件事，她说，你最好别知道。不是吗？我再一次恨起她来。为了保持威信，她承诺会找到小姑娘。希望不大，因为从前她总是打给她邻居找她，但现在那部电话一直不通，而她又完全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也不至于死了，见鬼，她说，我一个小时内打给你。

那是长达三天的一个小时，但是她找到了仍旧可以服务的、健康的小姑娘。我羞愧地回到那里，忏悔般一寸一寸地亲吻着她，从午夜十二点直到鸡鸣。那是一次长久的致歉，一次我承诺会一直重复到永远的致歉，仿佛一切都从起点重新开始了。房间破败不堪，不当使用毁坏了我从前所有的布置。罗莎·卡瓦尔卡斯让房间保持着这种样子，她对我说，任何改善工作都要由我来做，因为我还欠她许多。但我的经济状况

已经见底，养老金也越来越入不敷出。除去我母亲那些神圣的珠宝，家里仅剩的几样能卖的东西都缺乏商业价值，也没有东西旧到可以当古董。在从前的好日子里，市长曾想以诱人的价格从我这里为他们的图书室收购整套的希腊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的经典著作，但我当时无心卖掉它们。之后，随着政治的变化和世界的堕落，政府里再也没有人会去想艺术或文字了。我已经厌烦了寻找体面的解决办法，于是拿出了黛尔加迪娜放回我口袋里的珠宝，想去通往公共市场的那条凶险的巷子里把它们当掉。带着迷惘的学究气，我跑了好几趟那片塞满了破旧酒馆、旧书店和当铺的鬼地方，但芙萝莉娜·德迪奥斯的尊严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不敢。于是，我决定抬起头来，去那家最古老也最有信誉的珠宝店把它们卖掉。

在用独目镜检验珠宝的同时，店员问了我几个问题。他有着医生一样令人敬畏的举止和气质。我向他解释说这些都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珠宝。他嘟囔着附和了我的每一个解释，最后摘下了独目镜。

“很抱歉，”他说，“都是劣等货。”

面对我的惊讶，他带着些许同情解释道：但还好，金是金，白金也是白金。我掏了掏口袋，确定带来了购物发票，而后心平气和地说：

“它们是一百多年前在这间高贵的店里买下的。”

他不为所动。这种事时有发生，他说，继承的首饰上最有价值的珠宝会随时间渐渐地丢失，被家里的逆子或是骗子珠宝匠换掉了，直到有人想卖掉它们时，做假才会被发现。但是请给我点儿时间，他说道，随后就带着珠宝进了后门。一会儿他回来了，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示意我坐在等候椅上，便又开始工作了。

我审视着这个店面。我曾和母亲来过几回，仍记得一句反复被说起的话：别告诉你爸爸。突然间，一个令人气愤的想法跳进了我的脑海：会不会是罗莎·卡瓦尔卡斯和黛尔加迪娜串通好了，一起把那些真宝石都卖掉了，然后把做了假的还给了我？

正当我怒火中烧时，一个秘书请我跟着她从那扇后门进去，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办公室里。屋中放着一个很长的书架，上面摆有厚厚的书卷。一个高大如巨人的贝都因人从房间另一端的书桌前站了起来，与我握了握手，带着老朋友的热情用“你”称呼起我来。咱们一起上过中

学，他说，一副问候我的样子。我很轻松地记起了他：学校里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也是最开始去妓院时我们当中的冠军。我有些年没见他了，他一定是觉得我太过苍老，以至于认错了人，把我当成了他儿时的某个同学。

写字台的玻璃板上放着一些摊开的资料簿，上面有关于我母亲的珠宝的记载。一条标明日期与细节的确凿记录显示，她私自换下了美丽高贵的卡尔加曼托斯家族传承了两代的宝石，把真品卖给了这家商店。这应该是发生在现任店主的父亲经营这家珠宝店时的事，那时我们都还在上学。但他安慰我道：患难中的名门望族常会这样做，既能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又能保全名誉。面对残忍的事实，我宁可把它们留下来，作为对另一位我不曾认识的芙萝莉娜·德迪奥斯的回忆。

七月初，我感觉到了自己与死亡的真实距离。我的心乱了步子，我开始从各方面看到、感受到那些确凿无疑的对结局的预感。其中最清晰的一次来自在艺术学院举办的音乐会。空调坏了，艺术与文学的精英在拥挤的大厅中被烹煮着，但音乐的魔力却带来了天国的氛围。最后，在听稍快的小快板时，那个炫目的启示令我震惊：我正在听命运在我死前为我安排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所感到的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那种压倒一切的激动——真的到了要去经历它的时候了。

当浸在汗水中的我终于在拥抱合影的人群间挤出条路来时，却意外地撞上了坐在轮椅上宛如百岁女神的希梅娜·奥蒂斯。仅仅她的出现就仿佛降在我身上的一宗不可赦免的罪。她穿着一条光洁如她肌肤一般的象牙白丝质长衫，颈上套着一串绕了三圈的珍珠项链，珠光色的头发留着二十年代流行的发式，发梢似银鸥翅膀般垂在脸颊旁，黄色的眼睛被黑眼圈的自然阴影衬得很明亮。据说因为记忆力不可逆转的衰退，她的意识已渐渐趋于空白，然而她身上的一切都在反驳这条谣言。在她面前惊呆了的、手足无措的我强压下往脸上蹿的热气，默默地按照凡尔赛宫的礼仪向她送上了问候。她如女王般微笑了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这时我才发觉这是命运赐予我的辩护机会，于是趁机拔掉了那根一直折磨着我的刺。这一刻，我已经梦想了许多年，我对她说。她看上去似乎没有听懂。不会吧！她说，你是谁呀？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真的忘了，还是在完成生命中最后的报复。

对于必死命运的确信，也是在一个与那天相似的场合突然将我捕获的，那时我就快满五十岁了。狂欢节的一个夜晚，我正与一个显眼的女人跳着阿帕切探戈，我一直都没看见她的脸，她大约比我重四十磅，比

我高两拃，但带起这位舞伴来却让我感觉她轻盈如风中鸿毛。我们在跳舞时贴得那么紧，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她静脉中血液的流动，就在我愉悦地沉溺在她艰难的呼吸、散着氨气的汗臭以及天体一般的乳房中时，死亡的咆哮第一次冲向了，几乎将我推倒在地。它仿佛耳边响起的粗暴神谕：不管你做什么，在这一年，或是在你百岁之内，你终将永远地死去。她惊恐地与我分开了：您怎么了？没什么，我定了定神对她说：

“我在为您颤抖。”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用十年而不是年来丈量生命。五十岁后的那个十年是决定性的，因为我意识到几乎全世界都比我年轻。六十岁后的十年是最紧张的，因为我怀疑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犯错了。七十岁后是最可怕的，因为那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年。然而，当我在九十岁的第一个清晨，在黛尔加迪娜幸福的床上活着醒来时，一个悦人的念头刺穿了我：生命并不是像赫拉克利特^①的奔腾不息的河流那样流逝的东西，而是在铁算子上翻身的唯一机会，翻过来后还能继续把另一面再烤九十年。

我变得极易落泪。任何与温存相关的情感都能令我哽咽，而我也不是总能控制住自己。我曾想戒掉守护黛尔加迪娜睡梦的孤独乐趣，这不仅因为我的死亡的不可预测，更是因为我在想象她在没有我的余生中的样子时所感到的疼痛。在那段恍惚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发觉自己无意中走到了十分高贵的公证人大街，在将满十二岁时，我就是在这里的一家旅馆中被迫开始领略爱欲艺术的。然而令我吃惊的是，除了廉价转让的旅馆废楼，这条街上已经不剩任何其他东西了。那座旅馆曾是一些旧时船主的大宅，豪华程度在城中数一数二，拥有贴雪花石膏薄板的廊柱和嵌仿金箔片的墙裙，所环庭院上方是七色玻璃的拱顶，散射着暖房的光芒。大楼的哥特式大门朝街道敞开，首层是殖民地公证事务所超过一个世纪的所在地，我的父亲在他幻梦般的人生中，就是在那里工作、发达而后又破产的。历史上的大户人家渐渐抛弃了高层的居室，那里最终被些不幸的流莺占据，她们带着那些在附近内河码头的小酒馆里为了一个半比索钓来的客户，在楼中上上下下，直到天亮。

十二岁那年，我还穿着小学生的短裤和短靴，当父亲在永远开不完的会议中辩论时，我没能抵挡住探索大楼高层的诱惑，于是见到了天堂般的景象。上午十一点，彩色玻璃反射的热气便已经让人无法忍受，这时候，那些贱卖自己身体直到黎明的女人开始在大厦里走动，她们一面光着身子进行日常活动，一面大声分享昨晚的冒险。我被吓坏了，唯一

能想到的便是从来的地方逃走，就在此时，其中一个散发着乡村肥皂香味的身材紧实的裸体女人从背后抱住了我，在我还没有看到她的样子时，就在其他一丝不挂的邻居的叫喊与掌声中把无助的我拖进了她用纸板隔出的小隔间。她将我仰面扔在架子床的一个铺位上，用大师般的熟练手法脱下了我的裤子，骑到了我身上，然而内心冰冷的恐惧浸透了我，阻止了我像一个男人那样接受她。当晚，那场袭击带给我的羞耻令我辗转难眠，而怀着再次见到她的渴望，我只睡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在那些夜晚工作者还沉浸在睡梦中时，我就颤抖着上了楼，走进了她的隔间，带着一份疯狂的、一直持续到真实生活的大风将它无情卷走才停止的爱，哭喊着把她叫醒了。她叫卡斯托丽娜，是那栋楼中的皇后。

旅馆里的每一个隔间对每一次短暂情爱的收费为一比索，只有我们这些极少数的人才知道待上二十四小时也是同样的价钱。卡斯托丽娜同时也把我带入了她苦涩粗鄙的世界，她们会在节日时邀请贫穷的顾客一起吃早餐，会把香皂借给他们，会帮他们止牙痛，在最紧急的时刻，还会施予他们慈善的爱。

然而在我最后的老年时光中，已经没有人会在下午记起不知何时死去的不朽的卡斯托丽娜了。从内河码头那些破败的角落里走出来的她，最终登上了顶级老鸨的宝座，头上套着海盗的眼罩，遮着在一次酒馆斗殴中失去的眼睛。她最后一个关系稳定的床伴是个快乐的卡马古埃依黑人小伙儿，她们都叫他划船奴荷纳斯，他曾是哈瓦那最出色的小号手之一，直到一次火车事故让他失去了完美的微笑。

当我从那次苦涩的造访回来时，我感到心口一阵阵刺痛，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喝下了所有种类的自制汤药都无法缓解。给我看病的急诊大夫有着优良的血统，他是在我四十二岁时为我看诊的那位医生的孙子，他们看起来仿佛同一个人，竟吓了我一跳。过早到来的谢顶、再也摘不掉的近视眼镜以及那无法安慰的悲伤让他看起来和他七十岁的祖父一样老。他带着金匠的专注仔细检查了我的整个身体，从前胸和后背听了心跳，测量了动脉血压，检查了膝跳反射、眼底，以及眼睑内部的颜色。在检查的间隙，我在检查台上变换着姿势，他则在一旁随意而快速地问我问问题，甚至都没有给我时间思考答案。一小时后，他带着幸福的微笑看着我。好了，他说，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您做什么。您的意思是……您现在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您这个年龄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真奇怪，我对他说，我四十二岁时您祖父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好像时间没有流逝

一样。您永远都能找到一个人这么对您说，因为您总会处在某一个年龄。而我，为了逼他做出一个可怕的诊断，对他说：只有死亡才是确定的。是的，他说，但是以您这么好的状态，还真不容易走到那儿。真的非常抱歉，我不能让您满意。

那是很体面的回忆，但在八月二十九日前夜，当拖着沉重的双腿爬上家中的楼梯时，我感受到了正冷漠地等待着我的那个世纪的巨大重量。然后我在我的床上看见了我的母亲芙萝莉娜·德迪奥斯——在她去世前那一直是她的床——她像去世前两小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那样给了我祝福。情绪遭遇极大起伏的我认为这是最后通告，于是便给罗莎·卡瓦尔卡斯拨了电话，请她当晚把我的小姑娘叫来，以防我苟活到九十岁的最后一口气的心愿落空。八点时我又打给了她，她再一次重复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做到，不惜任何代价，我穷凶极恶地喊道。她没有道别就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她打了回来：

“好了，她能来。”

晚上十点二十分，我到了那里，并把我人生最后的几封信交给了罗莎·卡瓦尔卡斯，还对她讲了在我可怕的结局到来后关于小姑娘的安排。她觉得是那次刺杀给我留下了阴影，便嘲讽道：你要是死也别死在这儿，想象一下吧。我回答她：你就说我被哥伦比亚港的火车撞了，虽然那可怜的破铜烂铁谁都轧不死。

那晚，我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我躺了下去，等待着最终的疼痛在我九十一岁的第一时刻降临。我听见了远处的钟声，闻到了侧身睡着的黛尔加迪娜灵魂的芳香，听到了地平线上的一声呼喊，以及也许一个世纪前便死在了这卧室中的人的啜泣。我带着最后一口气熄灭了灯光，十指交叉拉起她的手，然后伴着我最后的十二滴眼泪，开始数算十二点的十二次钟声，直到公鸡开始打鸣，荣耀的钟声和圣日的爆竹声响起，它们都在庆祝我健康平安地活到了九十一岁。

我的第一句话是说给罗莎·卡瓦尔卡斯的：我要买下你的房子，所有东西，包括店和果园。她对我说：咱们打个老年人的赌吧，谁活得长就继承另一个人的所有东西，要在公证处签协议。不行，因为如果我死了，我的所有东西都得给她。其实一样，罗莎·卡瓦尔卡斯说，我会对这姑娘负责，以后还会把我的所有东西都留给她，我的，还有你的；我在这世上没有别人了。而且，我们还会改造你的房间，铺设好的管道、装上空调，把你的书和音乐也搬进来。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

“哎哟，我忧郁的学究，你老了就老了，别这么胆小啊，”罗莎·卡瓦尔卡斯说着，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那可怜的孩子正疯狂地爱着你呢。”

我走到了明晃晃的大街上，第一次在人生第一个世纪那遥远的地平线上认出了自己。清晨六点十五分，我的家沉默而有序，正要披上幸福霞光的色彩。达米亚娜在厨房放声歌唱，而那只起死回生的猫在我的脚踝旁卷起了尾巴，跟着我走到书桌前。当我整理自己那干枯的纸张、墨水瓶和鹅毛笔时，太阳在公园的巴旦杏树林与内河邮政船间爆射出了光芒，那艘船因干旱而迟到了一个星期，正咆哮着驶入港口的水道。终于，真正的生活开始了，我的心安然无恙，注定会在百岁之后的某日，在幸福的弥留之际死于美好的爱情。

二〇〇四年五月